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悲劇或鬧劇？

論 Maurice Meisner 眼中的中國

Tragedy vs. Farce: Maurice Meisner's Historiographic
Indecision on Maoist/Chinese Socialism and Its Aftermath



許韋婷

Wei-ting Syu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March, 2010

致謝

會選擇 Maurice Meisner 作為研究對象，碩一的北京行是很的大關鍵，而此趟旅程之所以得以成行，完全是受惠於石之瑜老師無私的協助。因此可以說，這本論文從還未成形，到最後的完成，石老師的協助一直具有相當關鍵的地位。而孫善豪老師則可說是我的啓蒙老師，他帶領我認識馬克思主義，且對於我的愚鈍始終有著極大的耐心，讓我即使遇到許多理解上的困難，卻仍然可以保持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最後甚至還擔任口試委員，為論文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對我的研究而言，同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溫洽溢老師雖素昧平生，但其研究對我的論文卻有著許多幫助，且從擔任大綱口委的那一刻起，他和善的鼓勵與詳實的建議亦對我論文的寫作方向有著很大的影響。所以，很感謝三位老師，如果沒有他們，我的研究也不會如此順利。

除此以外，歷時一年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亦在我論文寫作的過程中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許多資料在閱讀當時，未預期將為論文所用，但卻在寫作時赫然發現它們對我的論文有著相當大的重要性。而這些資料，絕大部分都是張又升選擇的，且在開讀書會的過程中，由於他毫不吝嗇地貢獻其寶貴的學識，才讓我得以深入地理解這些文本，非常謝謝他。當然，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亦是我論文寫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心靈支柱。所以我要特別感謝爸媽、兩個弟弟展誠與展富；時時陪伴著我的一仁；以及經常關心我的信彰、筱儒、怡璇、德建學長、智權、文蓉、阿泰、小白、柏諺、任翔、怡文、青逸、曼寧、佑立、曉雲、單單和大頭。

當然，我絕不會忘記每當我心煩意亂，快被焦慮的情緒給淹沒時，收穫豐富的田園與善體人意的寵物，讓我心神安定，進而文思泉湧的功勞。我很幸運在這整個過程中，能夠獲得這麼多人的幫助與關懷，沒有你們，就不會有這本論文。但這本論文如果有任何不周到的地方，全部都是我的責任。碩士生涯即將結束，我也即將踏入新的且未知的人生階段；因此，僅將這份論文獻給未來的我，期望未來我能在這個基礎之上，擁抱更多的智慧，無懼地向前。

摘要

馬克思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則是以鬧劇出現。而共產中國的歷史究竟是一場重複蘇聯歷史的鬧劇？還是一場獨特的、在歷史舞台上第一次登場的悲劇？不同的答案，代表的是不同的立場，特別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場。

Maurice Meisner 是美國中國學學術社群裡，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要學者。他以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理解，做為詮釋中國歷史的理論架構，並因此做出對不同時期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評價。這些評價不僅對中國研究有著影響力，同時也引發了不少爭議。例如他將毛澤東思想上升到毛主義的理論位置，並且指出毛主義裡的民粹主義、唯意志論與烏托邦主義成分。而他指出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已逐漸遠離社會主義，更受到中國學者強烈的批評。不過，即使他對中國懷抱著失落感，卻仍然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偉大的，並且同意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有著許多的貢獻。因此，對他而言，共產中國的歷史雖然因其獨特性而非是重複蘇聯歷史的鬧劇，但卻因逐漸遠離目標而為以失敗結尾的悲劇。

只是，若進一步檢驗這樣的詮釋，以及其他人士對於 **Meisner** 研究的評價，則可以發現他們爭論的核心，正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理解。且這些理解還同時反映了時代的需求，亦即隨著客觀環境的演變，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不斷的擴張，但也因而離馬克思的思想越來越遠。此外，**Meisner** 對於中國的詮釋亦反映其政治理想，且這樣的理想更是他批判中國的標準，而這樣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不過，**Meisner** 的嘗試與其研究成果仍然是受到廣泛肯定的，即使他所採用的研究架構已逐漸不為人所用。因此，希望藉由本研究的重新檢驗，能使人更深入的理解這樣的架構，進而使得未來其他的研究者能有一個可見的對照，以豐富中國研究。

關鍵字：Maurice Meisner、馬克思主義、美國的中國研究

Abstract

Marx once said, all great world-historic facts and personages appear twice: the first time as tragedy, the second time as farce. Does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eat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and just be a farce? Or, is it a unique one to the history and, accordingly, a tragedy? The different answers represent different position, especially on the Marxism theory.

Maurice Meisner is an important scholar who studies modern China history in American China scholars. He applies a speci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to studying China and judging Chinese Marxism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His writings have affected not only China study, but also incurred a much wider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Marxism. Specifically, he summarizes Mao Zedong's thought into what he calls Maoism. Moreover, he identifies the populist, voluntarist, and utopianist ingredients in Maoism. Chinese scholars are especially critical about his treatment of post-Mao era as a move away from socialism. Although he is disappointed 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nonetheless believ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that Mao contributed dearly to the evolution of Marxism. One could gather from Meisner, on one hand,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unique, hence not just a farce that repeated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On the other, since China has aborted its socialist goal, it is a tragedy or a failure.

However, Meisner's engagement with other Marxist scholars reflect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Marxism, which primarily answer to the need of the time. Marxism of different period vary and the later ones expand on the earlier ones. Marxism inevitably moves away from Marx's original thought. After all, the interpretation offered by Meisner could only reflect his political ideas of the time by which he evaluates Chinese socialism. Despite controversy around his scholarship or today's lack of interest in it, Meisner is widely recognized scholar. Revisit to his scholarship should be useful in refreshing on how China studies have move a long way as well as how Meisner's legacy could be an enlightening contrast to what is thought as obvious today.

Key words: Maurice Meisner 、 Marxism 、 American China study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Maurice Meisner 簡介	2
第三節	問題意識	5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8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0
第貳章	哪裡來的劇本？Meisner的學術社群背景	12
第一節	美國的中國研究	12
第二節	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16
第三節	中國學與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結合	23
第參章	用馬克思主義寫中國的劇本—Meisner的中國研究	25
第一節	革命時期的中國	26
第二節	建國初期	28
第三節	毛主義的中國	31
第四節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40
第五節	小結	43
第肆章	劇評——對Meisner研究的評價	46
第一節	Modern China的論戰	47
第二節	其他西方學者對Meisner的評論	52
第三節	中國學者對Meisner的評價	54
第四節	小結	60
第伍章	誰的馬克思主義？	63
第一節	何謂馬克思主義？	64
第二節	人道的馬克思主義	69
第三節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72
第四節	小結	76
第陸章	結語	81
第一節	一場以失敗結尾的悲劇	81
第二節	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馬克思	83
參考資料		86
附錄：訪談大綱		96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在蘇聯扶植下，中國共產黨於西元一九四九年建國成功，共產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正因為這樣的建國背景，中國¹不僅在建國初始受到蘇聯許多影響，即使在蘇聯垮台，中國宣稱將走自己的路以後，卻仍可以看到蘇聯影響的痕跡²。然而，在中國官方史家所建構的歷史中，中國卻是很獨立的，尤其在意識形態方面，更是從毛澤東即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而認為有別於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³。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在南巡時解決「走資」、「走社」的路線爭論後，中國官方所提出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似乎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根據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公布的定義，這樣的社會主義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科學發展觀的理論，乃是根植於中國的特殊國情所改良出來的結果，並且需要在中共的領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⁴。」

但是，這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還能稱作是馬克思主義⁵嗎？在「中

¹ 本研究所稱的中國皆採狹義解釋，指的是 1949 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² 關於蘇俄與中共的關連性，可見由蘇俄歷史學家 William G. Rosenberg 與中共歷史學家 Marilyn B. Young 合著的《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兩人以歷史研究的方法，深入的剖析堪稱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兩場革命，並且察覺到這兩個革命的發生不僅是根植於過去所累積下來的歷史條件，更因為當前（寫作當時為 1980 年代）所面臨的情勢，使得革命仍然持續著。因此，兩人視蘇俄與中國為革命的社會，且彼此互相影響。

³ 關於中共官方的說法，可以參見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著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在這本長達 640 頁的重要官方文獻中，僅以不到 2 頁的篇幅提及蘇俄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其餘的篇章則不斷的強調中共在歷史上的各項功績，而隱約彰顯出中國革命的獨立性。

⁴ 2009 年 2 月 1 日參閱自「新華網特別專題：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10/20/content_6912477.htm）中，由胡錦濤所發表的談話。

⁵ 本研究於使用「馬克思主義」一詞時，隨著不同的文字脈絡而有不同的意義。但在使用「社會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之下，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大量引入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並宣稱這樣的機制經過與社會主義融合以後，已成為一個符合中國國情並且有利於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馬克思主義的內涵出現看似如此空前的發展，當然受到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有的人認為社會主義已在中國消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政治口號，掩蓋不了中國施行資本主義的實質。有的人則認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於中國，並且在中國獲得新的生命⁶。

在這些爭論中，影射了一個觀察中國的矛盾視角，即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架構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以便確認中國能否或是否具有原本馬克思主義所未能規範到的政治經濟屬性。相對的，早在兩百年前馬克思研究法國時，就已經親自展演在特定國家條件下能夠進行的一個獨特歷史詮釋角度。本研究雖因為不涉及法國，以致沒有機會直接運用馬克斯本人的歷史詮釋，而是選擇試圖在中國的歷史環境中，開展類似馬克思在法國的歷史詮釋任務的當代著名學者 Maurice Meisner 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但藉由閱讀 Meisner 的詮釋，更有助於檢視兩百年後的馬克思主義對於當代歷史研究與政治經濟分析有何種影響、帶來何種效果，甚至是有何種缺陷。同時，亦期待經過這樣的再閱讀，在未來得以更全面的把握開展馬克思理論的可能方向，並以此提供繼續以馬克思主義觀察世界的一個有效視角。

第二節 Maurice Meisner 簡介

Maurice Meisner 出生於一九三一年的美國密西根州的底特律，漢名為「馬思樂」。在研究生獎學金的支持下，於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年間就讀於美國芝加哥

主義」一詞時，則是在不更動中國官方或是所引用的研究者的文字之前提而採用，本研究並未改變或增加其他的意涵。至於何謂馬克思主義，以及本研究較常採用的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意義，在第五章會有綜合性的討論。

⁶ 研究者於走訪中國，和北京的學生交流時，得聞這樣一個有趣的說法：中國現在所施行的制度，不只是可以稱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說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也行。但當研究者將這樣的說法提問於官方代表時，卻遭到嚴正的駁斥，並且指出這樣的說法是忽視了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創新所做的努力。

大學，並於一九五五年獲得碩士學位。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間又獲得美國大學校際研究生獎學金，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間則獲取福特基金會外國地域訓練研究生獎學金，並於一九六二年取得博士學位，師承研究俄國近代史的Leopold H. Haimson。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間他任職於哈佛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間擔任維吉尼亞大學助理教授，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間升等並任副教授一職，一九六八年更兼任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一九七〇年起他轉任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一九八〇年他曾經跟隨北美中國革命史考察團訪問中國，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間任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之後亦擔任倫敦經濟學院客座教授。Meisner為歷史協會會員與亞洲研究協會會員，曾經獲得哈佛大學當代中國研究獎金與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研究獎金，目前則已退休⁷。

Meisner的著作範圍包含了整個現代中國的歷史。一九六四年發表的第一本著作《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源起》(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藉由李大釗說明一九二〇與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如何受到外來理論的影響，並且奠定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一九七〇年代則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氣氛中，著重於研究革命者如何連結過去與現在，並於一九八二年將其研究成果出版，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對於毛澤東的思想有著詳盡的分析。而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則為國際上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著作，不僅許多相關研究多引註於此，台灣各大學開設的中共黨史或中國近代史的課程亦多選用此著作，甚至在美國的中國現代史與中共黨史等相關課程中，本書亦是教學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教材⁸。一九九六年出版《鄧小平時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探循

⁷ 2009年2月18日參考自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作者不詳。

<http://ilib.cn/A-QCode~xtgxyxb-shkx200801028.html>

⁸ 於訪談 Edward Friedman關於Maurice Meisner的學術成就時，Friedman盛讚Meisner以優美易讀的筆調寫了這本很好的書，因此獲得許多相關課程教師的青睞，選為課程的指定閱讀，對於美國

(1978-1994)》(The Deng Xiaoping era :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則分析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並同樣引起相當多的討論。於二〇〇七年出版的《毛澤東之政治與知識的圖像》(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的最新作品，雖還未受到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但本書除了整理Meisner自身對毛澤東的研究，亦整理了其他人的毛澤東研究之相關書目與參考資料，為後人在進行毛澤東研究時，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參考基礎與架構。(蕭延中，2000：483-484)

Meisner 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成果受到同樣具有「左翼」傾向的學者 Bruce Cummings 稱讚為中國研究界中最為出色的美國學者。因為相對於其他容易受到中國情勢影響而改變其敘述方式的學者，他認為 Meisner 具有高度的歷史敏銳性，能在聯繫過去和現在時，一直保有連續性與啟發性的在比較相關的歷史資料，進而產生出穩定且令人滿意，甚至最後將佔據主導位置的解釋。Cummings 更進一步指出，Meisner 與其他學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運用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其研究的批判性工具，雖然他所理解的不盡然完整，但仍因此做出許多獨特的解釋，例如對於毛澤東的高度評價。(Bruce Cummings，1997)

中國學者對Meisner亦有著相當高的評價。侯且岸即指出，在美國少數稱得上思想史研究者的人當中，Meisner即為需要充分重視的學者，特別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素養以及他對於美國研究無視於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批判。(侯且岸，2000：384-385)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的蕭延中即指出Meisner早在二十年前就能夠對於中國現代化建設提出客觀的批評，已引起許多的關注。因為Meisner從西方「現代性」所衍生出來的問題中注意到，中國所進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將帶來「諸如腐敗和兩極分化的現象」，果然正是中國後來所面臨的困境。但對於Meisner運用烏托邦主義和民粹主義作為詮釋毛澤東的理論，蕭延中則認為這是有待商榷的。他甚至還進一步指出雖然Meisner不斷強調其觀點是根植於真正了解並且是學生理解近現代中國有很大的幫助。

在其獨特的時空背景下所解讀的馬克斯原理，但認為Meisner僅只是在「馬克思早期關於社會異化的理論框架內評述現代中國的偉大社會改革」⁹。

由上述可見，Meisner所開展的歷史解釋的確有其不同之處，看似傳統地固執於過去所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實則因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著新的解讀而不同於以往。而這樣的分析方法，使得他對於中國的歷史有著不同於別人的解釋，並且在現在的學術界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而本研究將深入探討Meisner對中國的歷史分析，並且試圖探循這樣的歷史分析方式對於理解中國有著什麼樣的影響，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三節 問題意識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當共產中國在蘇聯的扶植下成立的同時，一個明顯的對照也跟著出現了，特別是對蘇聯有著許多不滿的人。例如在討論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典著作《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中，Sweezy即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來作為蘇聯的市場依賴路線的對照，並且認為中國的路線才是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蘇聯則是在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或者如Bettelheim所定義的「國家資產階級」(state bourgeoisie)服務。(Paul M. Sweezy & Charles Bettelheim, 1971: 31)尤其，Sweezy在將毛澤東與列寧的成就並列之餘¹⁰，更宣稱中國已經獨立自主的發展出一條仍與資本主義社會有著連繫的社會主義道路，並且相對於蘇聯的失敗，中國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能夠通過時間的考驗同時影響力將越來越大的模範。(Paul M.

⁹ 本段整理自Maurice Meisner本人所著，張寧、陳銘康等人譯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的譯者序。此譯者序經過向蕭延中老師確認，實為其親筆所做。

¹⁰ Sweezy認為，由於毛澤東和列寧，中國和俄國才得以有這樣偉大的革命。但列寧還未參與到社會主義的建設就逝世了，毛澤東卻領導中國持續革命超過二十年，並且獨立創造出中國自己的道路。詳細的討論內容請見Paul M. Sweezy & Charles Bettelheim, 1971,第 119 至 122 頁。

Sweezy & Charles Bettelheim, 1971 : 105)

Selden 雖然對於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有所批評，亦檢討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所主持的強迫集體化路線對中國農民所帶來的災難，以及對社會主義發展各方面的阻礙 (Mark Selden, 1991 : 64)，但仍然指出中國在抗日戰爭、土地革命和早期的合作化時期中，能夠有創意的結合民眾的支持，進行相關的制度改革來擴張人的自由和社區的範圍。這樣制度改革不僅有助於擴大生產力與提高許多人的收入，並且提供了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過渡時期的衡量標準。(Mark Selden, 1991 : 114)

仔細考察他們當時對於蘇聯批評的內容，再對照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情景，則會以為馬克思所提示的歷史觀在中國得到了驗證。Sweezy 在主張社會主義應是將決定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並且必須有全面的計畫經濟的前提下，指責蘇聯在史達林的帶領下所施行的「新經濟政策」，不僅在政府、共產黨、經濟上將權力集中在少數領導階層，並且無限制地運用物質刺激來提高工人工作的意願以及工業的生產率。根據他的觀察，結果是造成社會各階層分化加劇、群眾脫離政治等與共產主義發展相違背的現象，甚至還製造出新的「國家資產階級」，這個新的階級不但握有巨大的權力，在政治、經濟、教育方面持有高度的優越地位，權力和地位甚至還可以傳遞給他們的子女。(Paul M. Sweezy & Charles Bettelheim, 1971 : 125-128)

研究焦點為經濟政策檢討的 Selden，則反對 Sweezy 所主張的這種「動員式集體主義」，認為蘇聯的政策實際上是以國家暴力來取代市場的功能，利用價格和銷售配額的機制，高度剝削農民來奠定工業化高度發展的基礎。相對的，中國農業的集體化即不同於蘇聯那種由上而下的政策，而為一種漸進的、自願的合作化策略，不僅國家在過程中很少使用暴力，也保護了農業的發展。但不同於 Sweezy 對中國的讚揚，Selden 更進一步檢討後期中國也同樣採取了強迫的集體

化策略，重演了蘇聯透過國家暴力的剝削，壓榨出促進工業成長的利基。(Mark Selden, 1991 : 24、47-64)

值得討論的是，無論是 Sweezy、Bettelheim 還是 Selden，當他們在批判蘇聯甚至是中國時，他們所使用的理論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還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對蘇聯的失望出發，或從某種他們體認的馬克主義的願望出發的呢？更直接的說，他們批判的依據是否真的都是出於馬克思？例如 Sweezy 與 Bettelheim 關於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辯論，其實在馬克思的著作裡正是討論最少的地方，其所運用的理論是否是馬克思的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同樣的，當 Selden 在分析蘇聯與中國的經濟政策時，關於馬克思對於農民的觀點、對於農業輔助工業的論點也是有待考察的。

比前述三位學者更為後期的 Maurice Meisner 也必須面臨同樣的質問，尤其當他宣稱有一種所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時，更需要進一步考察他所認識到的這些理論是否仍然算是馬克思主義？而他本身又是如何詮釋馬克思的理論，並且將這樣的詮釋套用在中國研究上？他採用的詮釋角度是否有讓他跟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有所不同，因而使得他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有著不一樣的觀察視野甚至是成就？

此外，當 Meisner 在分析某項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時，例如馬克思對於農民在革命中所界定的角色，Meisner 總是會同時將蘇聯與中國做為案例進行分析，有時亦會有進一步的比較。如此看來，他是否也有著和前述學者同樣的傾向，亦即僅將中國作為一個蘇聯的對照組？再者，當他在批評蘇聯時，例如評論蘇聯改革中明顯的資本主義特質時，他又如何看待中國似乎以鬧劇型式不斷的重複著蘇聯的歷史？還是對他而言，中國是完完全全不同於蘇聯的，不是重複歷史的鬧劇，而是獨特的、在歷史上第一次登場的悲劇？

綜上所述，本研究希望可以藉由這些角度探究 Meisner 所認識到的馬克思主

義與中國，以及其研究受到中國學知識社群和左派知識社群怎樣的關注與討論。又或者，他的研究受到這兩個知識社群如何的關注與影響？最後，本研究期待能藉由回答這些問題，尋找出 Meisner 所在的位置，並以此理解這樣的學術研究的影響力，進而尋找更多中國研究的可能性。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屬於「『中國學』知識社群之跨國研究計畫¹¹」框架下的研究，主要研究目標在於跨越以英語為主導的中國學研究所設下的障礙，擺脫對西方主流知識的依賴。如前所述，自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中國研究結合社會科學方法，而歐美社會科學研究主流的主張，是將中國視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科學法則的個案，因此研究對象不過是外於研究者且與之毫無關聯的客體。雖然有所謂本土社會科學的主張，承認當前歐美主流的研究使中國研究受限於出自歐美歷史經驗的問題意識，因而有必要根據中國本身的經驗加以修正，但基本上卻仍然將中國視為一個貢獻於普遍法則建構所依賴的案例。本研究則反是，認為中國、中國研究與中國研究者之間，有著相互構成的關係，因此中國本身不存在作為客觀研究對象的可能性。認識中國同時必須認識中國研究者及彼等所從出的中國學社群，故而必須從整理、歸納、解構各個研究社群對於中國的研究，亦即須試圖呈現世界各個中國研究社群的知識生產脈絡，以促成各個社群對中國研究的反省與重建，進而提供一個有別於西方主流的中國研究之研究架構。美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研究也不例外。

中國學的知識計畫的研究範圍涵蓋了日本、澳洲、印度、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蒙古、俄國以及美國。美國雖然是目前中國學研究的主流，但美國中國學界也存在非主流知識社群，本研究主要研究的對象即美國邊陲的左派研究知識社群屬之。準此，針對 Maurice Meisner 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架構來

¹¹ 詳細計畫內容請見 <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01.php>

研究中國，本研究即試圖審視 Maurice Meisner 身為研究者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其研究所處的心理與社會條件如何影響到其中國觀察，而中國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宣稱是否也同樣影響著 Maurice Meisner 的研究，而他的中國研究和其他人有何不同，以及又如何影響他在美國中國研究中的位置？再者，Maurice Meisner 是否對自己所生產的知識具有反省批判的意識，從而掌握他所屬的知識社群的文化、歷史脈絡以及所處的當代情境，對他的中國認識具有什麼意義？

本研究採取後設研究的詮釋方法、文本分析、論述分析，以及實證研究之訪談方法，將蒐集並整理 Maurice Meisner 的研究做為敘事文本，了解其間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研究架構。同時亦將蒐集與整理其他學者對於 Maurice Meisner 的相關討論，描繪出 Maurice Meisner 所屬的知識社群，以及研究該社群的研究狀況、影響力與曾經出現過怎樣的爭議與討論，並且進一步了解 Maurice Meisner 在該社群中的位置與影響力。此外，更將採取深入訪談的方法，訪問熟識 Maurice Meisner 研究與學思歷程的 Edward Friedman¹²，以深入了解 Maurice Meisner 的研究。最終則期待自身作為一個研究的初學者，能夠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共同認識進而審視自己的知識視角究竟是從何而來，並且反省自己在知識上有著怎樣的缺陷，讓自己能和研究共同成長與學習，則為此研究所期待的另一項可能的附加成果。

¹² 該計畫建議訪談可以同時採取開放式與封閉式的方法，並且在封閉式的訪談方面，建議需圍繞二十一道問題：(1) 如何進入中國領域；(2) 求學過程；(3) 哪些大事影響過自己；(4) 研究題目如何選定；(5) 如何進入教職或研究職，及開課；(6) 學會與研究會的歸屬，師承；(7) 研究經費的來源；(8) 教學內容的設計；(9) 對學生的看法；(10) 對該國中國學界的看法；(11) 對其他國家中國研究的接觸與看法；(12) 受西方思想 (Hegel, Marx, Weber, Parsons, etc.) 與西方中國研究的影響；(13) 是否常去中國？在中國有什麼經歷？(14) 與中國學術界或其他人有什麼接觸經驗、共事經驗？(15) 有沒有熟識的中國友人或親戚？如何結識的？(16) 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如何演變；(17) 研究發表的過程；(18) 研究過程與研究經驗 (包括課題、材料、方法)；(19) 經歷 (閱讀、旁觀、參與) 過的學術辯論；(20) 最大的成就與遺憾；(21) 對中國研究未來方向的想法。但由於本研究未能訪談 Maurice Meisner，因此訪談問題將有所調整，並將訪談大綱至於附錄。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六個章節。第一章於前言說明研究動機後，介紹 Maurice Meisner 的個人背景，最後則說明問題意識、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是整理 Meisner 的學術背景，以作為之後探討 Meisner 的研究之基礎。而由於 Meisner 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中國研究的主要架構，且 Meisner 無論是個人的成長環境或是之後的學術生涯皆定著於美國，因此此章以美國的中國研究和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為主要整理範疇。又因為共產中國的興起，兩大範疇開始有了交集，故亦整理相關研究。

第三章則正式進入 Meisner 的研究內容。此章主要是以《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一書為主，其他著作為輔，依造歷史時序的安排整理 Meisner 的研究內容。整李的過程中，將特別注意 Meisner 所運用到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以及他對於馬克思、恩格斯、托洛斯基、列寧、毛澤東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所作的分析與評價，以深入了解 Meisner 本身如何詮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 Meisner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與評價。

第四章則將整理其他人對於 Meisner 的評價。由於 Meisner 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兩面性，因此受到來自美國的中國研究社群與中國之馬克思主義學術社群的關注。而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社群裡，曾經有一場以《Modern China》期刊為主要戰場，由 Richard M. Pfeffer 發起的論戰，並以 Benjamin Schwartz、Stuart Schram 和 Meisner 為主要攻擊對象，而受到廣大的迴響，且無論支持或反對方皆有精彩的論辯。因此本研究透過研究此論戰，不僅可以了解 Meisner 所在的學術社群之面貌，亦可以從旁更深入地理解 Meisner 的研究內容。此章的第二個重點，則為中國的學者對 Meisner 的評價。由於 Meisner 經常被中國的學者提及，將之視為美國中國研究中的重要學者，甚至還將 Meisner 劃為美國學術社群所未有的「馬克

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社群以特別研究之，由此可見 Meisner 在中國的影響力。因此，相關的研究的整理有其必要性，且將透過這些內容理解中國本身對於 Meisner 這樣一個外來的研究者有怎樣的認識，以及 Meisner 在哪些方面影響了中國的學者。另外，此章亦會盡可能尋找並整理其他學者對於 Meisner 的討論與評價，以更完整地了解 Meisner。

由於無論是 Meisner 或其他評論 Meisner 的研究者，都宣稱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但若詳細檢視，將發現每個人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皆有著不一樣，甚至彼此有所矛盾的內容。因此，第五章則將回溯 Meisner 以及第四章所提及的學者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內容，並且還要更往前挖掘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此一來，或許可以釐清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並且在這基礎之上，更深入地認識 Meisner 的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以及其他人在評價 Meisner 的同時，背後所持的依據實際上又是什麼。第六章則將總結本研究，並且回應第一章在所提出的問題。亦即定位 Meisner 的研究位置，以及對於其學術社群有著怎樣的影響。最後，或許會發現，無論 Meisner 的主要關懷究竟是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Meisner 的中國研究都是具有獨特性，同時也存在著某些問題的。至於中國，或許不過是一場還未結束而且仍有著豐富生命力的戲劇，會讓它成為悲劇或鬧劇的實際上是研究者本身的視角，而不是中國自己。

第貳章 哪裡來的劇本？Meisner 的學術社群背景

本章主要目標是在於整理美國的中國研究與馬克思研究的發展情況，以做為之後探討 Maurice Meisner 學思性質的基礎，並回答 Meisner 致力於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究竟是出自於對中國的關懷，還是出自於對社會主義的關懷？他所進行的究竟是中國研究還是馬克思主義研究？他想要對話的對象是中國研究者還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究竟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亦或是中國研究的課題？而本章整理的兩個研究領域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但為了不讓問題失焦，因此僅概略性地介紹各個時期的重要發展，而不進一步探討各個理論的細節，以求能縱觀性地了解此兩大背景。在中國研究部分，主要仰賴 David Shambaugh，Andrew Walder，Richard Madsen，柯保安，侯且案等人的回顧；在馬克思主義部分，則主要借用 Louis Hartz，Werner Sombart 與 David McLellan 的介紹。後來這兩個一開始截然不同的研究，因為中國共產政權的出現，使得兩者得以進一步結合，而 Meisner 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究，即為此結合所產生的研究課題之一。

第一節 美國的中國研究

美國的中國研究直到一八三〇年代至一八四〇年代間才逐漸興起，一八八〇年代許多大學相繼設立相關的教學和研究機構。與歐洲相較，兩者同樣是以傳教士為首批研究者。但相對於歐洲早就為了因應傳教的需要所作的中國研究，美國對中國的研究可說是相當的晚。當代中國的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美國的中國研究雖然一開始也如同歐洲是以研究中國語言文字、文物、歷史、地理和思想文化的「漢學」為核心，但與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和對華策略有著緊密的關聯，因而不同於歐洲。由於目的不同，使得歐洲對中國較能有真實的介紹，美國的學者則多以現代化的標準來評價中國，並期待最終能改造中國，以銜接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到了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學社」，標示了美國漢學研究的良好發展，

該學社不僅收藏了豐富的研究資料，亦推動許多中西交流的活動，因而使得哈佛大學成為美國研究中國的中心，而費正清即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尙慶飛，2008：7-8)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則使得中國研究從傳統的漢學跳脫開來，不再限於研究語言、文化、歷史、宗教的經典，而揭開區域研究的序幕。於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太平洋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即標示了這樣的轉向，它不僅培養出許多亞洲研究專家，且仍相當重視語言訓練，甚至還提供經費予以支持研究者進入所研究的區域以蒐集更多的資料。(尙慶飛，2008：7-8；侯且岸，2000：241-246)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第二次大戰爆發期間，以 Edgar Snow 為首的左翼新聞記者實際進入中國採訪，並且特別關注共產黨革命的情況，同時亦開闢了一條不同於學術模式的中國研究。特別是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於共產黨相關資訊封鎖的背景下，Edgar Snow 所出版《紅星照耀中國》(之後中譯版改名為《西行漫記》)因詳細且全面地記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人物、歷史與活動，而受到西方世界許多關注。(侯且岸，1995：40-53)

中共所建立的新中國，則使得這樣的轉向因此固定下來，並且以歷史學為主體進行跨學科的研究，特別是，更開始嘗試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將中國視為研究的案例之一，推斷發生在中國的事務有無因果規律。因此，為區別以往的中國學，此時期所展開的研究被稱為「現代中國學」。(Whyte, Vogel, & Parish, 1997：179-180；侯且岸，2000：250-251)但資金的缺乏、資訊的隔絕以及冷戰局勢的緊張所造成的政治禁忌氣氛，成為美國的中國研究的障礙。此時期的研究是以1943年成立的「遠東機構」(即一九五六年改制的「亞洲研究機構」)為主力，但和社會科學沒有絕對的關連，而是美國政府為了防堵共產主義的需求所建立。(Bruce Cummings, 1997：8-9)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政府與福特基金會的挹注，加上美國學術環境本身的良好發展以及社會科學的革新進步，中國研究的環境才開始好轉，並且開啓了第一波的當代中國研究。但資訊隔絕的問題仍未能解決，因

此必須依賴二手資料以及香港、台灣等華人的協助，故無法進行科學主義要求的系統性的實證研究，只能做整體較宏觀的論述。(David Shambaugh, 1993 : 14-20)

1970 年代中國研究的條件開始好轉。好轉的外在條件是，一九七一年之後中國對美國的逐漸開放使得資料的取得難度降低，但也只有少數對中國較「友善」的學者得以進入中國研究，且只能在官方所設定的範圍內，蒐集官方所允許的資料。(Whyte, Vogel, & Parish, 1997 : 182-184) 至於內在條件的好轉，則是由於研究人才的日漸充裕，以及當時因為越戰所刺激出對亞洲研究的動機。中國研究的發展即因為這樣的條件而興盛，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出現，回應了美國青年對於美國政府參與越戰的不滿，連帶著中國亦成爲一個重要對照。因此不僅研究者甚至有著美化文革的傾向，在許多左翼青年學者的筆下，中國更是被理想化爲一個美好的平等社會，同時還有某種迴避將中國和其他國家比較的風格。另一個文革所帶來的影響是，由於文革期間許多人從中國逃出，非官方的資訊取得因此相對增加。(David Shambaugh, 1993 : 20-25 ; 侯且岸, 2000 : 276-277)

在這段期間，美國對中國的敘事基本上可分爲三種，即右派、左派和自由派。右派的敘事源自於早年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其間傾向以強烈的道德意識來評述中國，並且認爲如果沒有共產黨的控制所帶來的扭曲，中國人和美國人其實都是一樣能夠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的。左派則是將中共視爲社會改革的先鋒，並且能夠領導中國抗拒以美國爲首的國家主義，同時藉由中國亦能促進反省美國內部因爲資本主義而引起的社會問題。自由派則是標榜著「中立」且謹慎務實的態度來對待中國，主張美國應該以漸進的方式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並且藉此將自由市場引入中國，中國就可以轉型爲民主國家，最後這一種觀點在一九七〇年代後逐漸取得了主流的地位。(Richard Madsen, 1995 : 28-58) 但由於前提上是接受了一個自由主義的關鍵假設，即以「現代化」是一個普世、理性、可理解的世界進程，並認爲中國對世界的進步是有貢獻的。(Richard Madsen, 1995 : 115-119) 然而，「現代化」所具備的單線性與高度目的論特質，使得它所描繪的歷史發展圖

像具有封閉性。再者，若干論者質疑現代化理論隱藏徹底的種族中心主義，因為西方人認為自己具有優越的特質而得以搶先到達現代化，且主張自己的現代化途徑是可以普遍化的。(柯保安，1991：92)

同樣存在這三十年的另一個與本文相關的中國研究問題，是中國研究與既有學術圈的脫節。雖然當時學科間界限的不嚴格，使得不同領域的中國研究得以互相學習、共享知識的成果，但中國專家實際上對同領域的其他研究並未有足夠的認識，也不太重視社會科學的學術要求或關注為何。按照 Walder 後來對他們的分析，他們並不積極於跨學科的研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西方知識體系的參與者，甚至以不受西方學術特徵、內涵所拘束而自豪，種種條件使得他們的研究無法以西方理論驗證。(Andrew G. Walder, 2002：316-322) 他們認為自己的研究目的並不是關於西方，而是關於其他區域，使得他們不自覺的呈現出某種以中西差異為前提的西方主義。這樣的情況在一九七九年後有了根本的扭轉，因為中國本身和它在世界中位置都發生了改變。(Andrew G. Walder, 2002：314-326)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的後毛澤東時期，資訊重新且更加的開放，容許田野調查的興起，為中國研究帶來刺激和改變，但此時期美國國內學術環境卻遭遇到資金短缺的問題，使得中國研究產生困難，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才又好轉。反倒是非學術圈(例如媒體雜誌)對形成中國認識的影響力有所增加。(David Shambaugh, 1993：26-31)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又為中國研究帶來了重大的挑戰。事件導致若干美國學者相信，中國民主運動所要求的並不是美式自由，且有些民運勢力所代表的反而可能是舊體制的捍衛者。這樣的發現促使知識界反思其立場，發現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以及自由之間其實存在著衝突。因此若站在傳播自由民主價值的立場，美國要制裁中共。但相反的，若考慮站在穩定社會秩序以及維護經濟利益的立場，美國則是要同情中共。(Richard Madsen, 1995：4-6) 天安門事件亦使得研究中國的學者受到批判，他們被指控對中國過於同情，因此疏於提供正

確資訊，學者的影響力遭一定程度打擊。(David Shambaugh, 1993 : 33) 幸好後續能吸收到事件後大批滯美中國學者或後來的中國學生共同積極合作，仍使得中國的研究得以進一步發展，不僅是因為中文閱讀程度增加而提升了研究的深入程度，並且和研究者所屬社會科學的學科方法結合在一起，涉及中國研究的理論、方法也逐漸受到主流學門的認可。(Andrew G. Walder, 2002 : 331-333)

美國中國研究中的政治學科亦受到整體學術環境的影響。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之間，由於資訊的不發達使得研究焦點只能放在政黨和國家的基礎制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發生，才因為將研究焦點轉為分析這個事件及其影響，以及分析這個事件對於政治系統的衝擊，而對中國研究帶來新的轉折。後毛澤東時期的研究雖受到新制度主義的影響，但基本上與過去的議程仍有關連，有些還混合了過去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這個議題不僅持續受到關注，還延伸出政治制度的相關研究，但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卻從一開始的讚揚轉為強烈的批判。至於更近期的中國研究則主要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即使天安門事變發生，中國研究者仍未放棄以前所建立的結構典範 (David Shambaugh, 1993 : 122-128)，但因為中國推動了改革開放，研究者更加關心制度的轉型和市場的重組，而得以和政治學科相調和。(Andrew G. Walder, 2002 : 336) 另一個特點是，中國政治對西方學者而言仍然是複雜且不透明的。(David Shambaugh, 1993 : 122-128) 以同屬政治學科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為例，研究中國和研究前蘇聯的美國學者便有著很大的不同。研究中國的學者通常喜愛中國文化，而且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與變化有著深切的期許。但研究蘇聯的學者，即使他們也喜歡俄羅斯文化，但他們討厭當代的(前)蘇聯。(Richard Madsen, 1995 : 115-119)

第二節 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與歐洲相較，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雖然相對較不發達，但在馬克思在世時即已展開，並由於最初的帶動者多為德國移民，因此與歐洲的研究和實踐密切相

關，例如被稱為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 Joseph Weydemeyer 即為馬克思的朋友，且在紐約創立「美國工人同盟」，以「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直接改善工人的生存狀況」為宗旨進行實踐的工作。第一國際亦隨後於一八七〇年成立支部，並主張「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能建立政黨從而奠定可靠的基礎之前，因將工人階級所提出的要求擺在第一位」。然而該支部卻在四年後宣布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八八〇年代成立的北美社會主義工黨，並因參與選舉失利而間接促成美國勞工聯合會於一八八六年創立。社會主義工黨一直要到 Daniel De Leon 於一九九〇年代逐漸取得主導權後，才逐漸活躍起來。他主張馬克思主義與土地改革的民粹主義運動不能調和，亦不得與中產階級的烏托邦主義妥協。然而其強硬立場卻造成溫和派的出走，使得社會主義工黨在一八九九年分裂，並在二十世紀初被社會黨迎頭趕上。

相較於社會主義工黨，社會黨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較為微弱，並且內部的意識形態相當龐雜，而可以進一步依激進的程度區分為右、中、左三派。但也是社會黨的理論家們，藉由翻譯（例如《資本論》）以及研究的出版（例如 Louis B. Boudin 所著的《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促使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普及化。但這波熱潮在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鎮壓反戰的社會主義者的政策開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活動也因此沉寂下來。（McLellan, 2008 : 332-335）

直到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馬克思主義才在美國復興，並由從第三國際分裂出來的 Louis Fraina 和 Charles Ruthenberg 成立共產黨，另亦有較小規模的共產主義工人黨為美國本土人士所成立，但兩黨皆因叛亂治罪法而被迫以地下型式進行。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共產黨不但未能團結，主要因為內部對來自蘇聯的壓力有著不同的立場而造成分裂。不過，相對於受羅斯福新政¹³影響而衰弱

¹³ 羅斯福新政所帶來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讓另外一批原本將擁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美國視為共產主義革命溫床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見識到資本主義的韌性。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Paul Sweezy 即在《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一書中否定過往理論家所主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因為無法克服發展失調和消費不足的危機而崩潰的預設；相反的，他同意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國家干預的政策將有助於帝國主義內部的穩定。因此，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取決於外

的社會黨，共產黨因「反法西斯堡壘」的形象而吸引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然而好景不長，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繁榮經濟與麥卡錫主義的興盛，不僅使得共產黨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亦使得馬克思主義進入停滯與解體期。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馬克思主義在反越戰的浪潮催化下再度復興，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皆在此時期出版，其中最突出的三大領域分別是美國史、經濟學與新左派。美國史的部分又可再上溯至一九五〇年代威斯康辛大學的 William A. Williams，之後則有於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保守主義的勝利》的作者 Gabriel Kolko，以及於 1968 年出版的《自由主義國家中的企業理念》的作者 James Weinstein。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基礎，審視美國的自由主義歷史，提供了不同於其他史學家的視角。在經濟學方面，若按照 McLellan 的評價，則是美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最有獨創性貢獻支出，並以 Paul Baran 為代表。他對「經濟剩餘在發達資本主義中的作用」以及「壟斷性資本主義」的議題進行深刻的研究，並注意到第三世界之不發達正是西方國家得以發展的基礎。Baran 同時亦指出「資本社會中的龐大剩餘只能從軍費的支所耗盡，其必然結果是導致帝國主義，以及日益增長的戰爭可能性」。這些主張在馬克思主義研究裡引起廣大迴響，亦有許多研究者承襲這些議題做更進一步的探討。(McLellan, 2008a : 335-336, 341-342)

Herbert Marcuse 則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單向度的人》即為新左派思想的縮影。他對於美國社會中的自由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主張「在一個壓迫性的整體支配之下，自由可以被轉變成強有力的統治工具。」(McLellan, 2008a : 340) 但他所作的批判以及提出「工人階級與先進的資本主義進行結構性結合的理論」，事實上正標誌的他所承襲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即理論與現實的脫節。(Anderson, 1979 : 34) 因此，在美國所發展的新左派當然也脫離不了這樣的傳統。不過，不同於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新左派不只為工人發聲，更

來的因素，例如蘇聯等國的介入，才有可能使美國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Anderson, 1979 : 23)

為所有被壓迫的群體發聲；並因結合了與無政府主義相關連的各種諸如懷疑論——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唯心主義、某種存在主義、反工業化等等主張，以及諸如吸毒與性解放的生活方式，而受到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排斥。

相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而言，新左派更受到C. Wright Mills的影響，他以「群體菁英」的概念取代過去的「統治階級」概念，並且否定「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是歷史的主宰，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主宰力量」；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則僅來自於由E. Fromm所詮釋的青年馬克思所闡發的異化概念。而青年異化的概念在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出現，正呼應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張。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更早，於一九二〇年代就出現在歐洲中部、西部與南部，並以強調人的主體性和階級意識、哲學與文藝¹⁴，與當時主宰左派的列寧、史達林、布哈林等蘇聯領導人所主導的意識型態相抗衡。（洪鏞德，1996b：7）然而，這樣開放性的理論背景使得新左派缺乏共同的目標，因而在之後被目標較為明確的托派與毛派所取代。

然而，隨著美國自越南撤軍，以及學運的沉寂，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亦跟著低落下來，即使一九七四年曾有短暫的復甦，並重申「更全面地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的動力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的重要性」，但仍無法使得馬克思主義在美國興盛起來。（McLellan, 2008a：336-339）

對於馬克思主義（或者更廣泛地說是社會主義）在美國為何無法興盛，引起許多討論。研究此議題最著名的學者即德國的 Werner Sombart，他指出美國雖然有兩個社會主義政黨，但其基礎相當薄弱，而且美國工人所信奉的社會主義，是不同於歐洲那種具有馬克思主義特徵的社會主義。因為美國工人對現實生活並無不滿，因而不具備歐洲工人因階級意識而生的情緒。（Sombart, 1976：16-18）美國本土的學者 Louis Hartz 對於階級意識的缺乏有更深刻的解釋。他指出若從

¹⁴ 這樣的主張，有時會被視為是一種人道的馬克思主義。

歐洲的經驗來看，當自由主義者遇到困境時即會轉向社會主義尋求理論上的寄託，但美國卻未出現這樣的轉向，根本的原因即出在美國與歐洲有著不一樣的起點，美國缺乏舊有封建社會的背景，因此美國的自由主義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以反封建為起點，而反封建的意識正是階級意識形成的重要條件。(Hartz, 1955 : 233-235) 相對的，美國工人擁有著歐洲工人所缺少的愛國主義情緒，因此在無產者即將受到衝擊的時候，法西斯主義就會以「美國主義」的面貌在美國社會取得主導的力量，因而排除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可能性。(Hartz, 1955 : 279)

再者，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亦壓抑了第三黨發展的空間，例如多數代表制即使得公民不願意將選票投給獲勝機率較小的第三黨；而擁有雄厚財力且歷史永久的兩大黨在沒有意識形態包袱下，能夠輕易的吸收第三黨的政策，甚至網羅他們的人才。但在此同時，成熟的民主制度卻使得工人可以藉由行使公民權，使其需求和主張獲得滿足，甚至還有機會獲得公職以親自實踐其理想。(Sombart, 1976 : 29-58) 也因為這樣，美國的社會主義命運與「自由主義改革」的命運緊密相連，並具體的表現在諸如羅斯福「新政」的政策表現上，進而使得被吸收走許多政策主張的社會主義政黨逐漸消亡。(Hartz, 1955 : 228-229, 277-283) 此外，因為物質需求得到滿足而對資本主義所持有的好感，並且認為自己與雇主並非對立的關係，有些人甚至還具有老闆的思維。(Sombart, 1976 : 18-22) 又由於沒有歐洲封建制度的歷史背景，美國工人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受到雇主良好的照顧與尊重，因此不僅不認為自己是屬於「下層階級」，且其穿著舉止亦形同歐洲的中產階級甚至是貴族階級。最後，他更指出，即使仍然存在部分不滿現況的美國工人，他們也因為西部拓墾的機會，得以轉身成為自由且獨立的農場主，進一步加入資產階級的行列。(Sombart, 1976 : 109-119) McLellan 另外補充了與西部拓墾同樣重要的問題，即持續從海外湧入的移民使得美國社會出現種族分化的問題，進而阻礙了工人們的團結，亦取代階級問題的重要性。(McLellan, 2008a : 339-340)

雖然馬克思主義，甚至是社會主義，在美國無法取得主導的力量，但是相關

的研究卻未曾停歇。近年來更因學者們的積極參與，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重心，逐漸從歐洲轉向英美，其中幾個相當受到關注的議題包括，市場社會主義、分析論的馬克思主義、理性選擇論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反省討論。市場社會主義論題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東歐國家逐漸拋棄計畫經濟的政策轉而增加市場在經濟政策上的作用、戈巴契夫的改革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刺激。市場社會主義的主張又可因討論焦點的不同而分為兩類：其一是以利潤的極大化和平等的分配為核心，John Roemer 為主要代表，並提出銀行國有化、企業交由銀行、工人和股票持有人共同委託的代理人經營管理、不能換取現金只能與其他股票進行交換的特殊股票必須平均分配給每個公民的各種新制度主張。其二則是以工人對生產資料的管理為重點，David Schweikart 為其中主要代表。他提出名為「經濟民主」的新制度，且其基礎必須建立在工人對企業的自我管理、投資的社會控制，以及商品和服務的市場。這些主張雖然解決了資本與勞動分離的矛盾，但並未克服社會化生產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並且與馬克思所主張的按需要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原則相悖離。相較之下，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較為接近「分析馬克思主義」，或可以更進一步的因其以個人主義為核心而可另外稱作的「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McLellan, 2009: 5-6)

「分析馬克思主義」自一九八〇年代出現且盛行後，便被部分英語系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¹⁵視為一種重要的象徵，即他們已經可以不再依賴歐陸的理論，而獨立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但有些學者則不認為「分析馬克思主義」可以被視為一種新的理論，甚至也不能稱作是一種新的學派或運動，而僅僅只是一種現行研究的現象，並且可以因為不同作者的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研究另有別稱。例如「博弈論馬克思主義」、「新古典馬克思主義」，或是「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並未有統一的核心信念，甚至連研究途徑也

¹⁵ 雖然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只是出現在英語系國家，但是大致上是以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紐西蘭為主要地區，並且受到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的影響。(Ware & Nielsen, 2002: 26)

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分析」一詞則是因馬克思主義受到「分析哲學」的關注而得到，他們主張「探討馬克思主義的人以概念明晰、論證嚴謹這樣的高標準作為要求自己的一種方式」，並且不同於以往馬克思主義聚焦在整體的研究，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更為關注細節。因此，他們在解構宏觀理論和綱領性宣言，以及理性審判有爭議性的理論前提兩方面，有著一些外界認可的成就。然而，相對於哲學家，作為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家，例如Roemer更強調的是運用「現代邏輯、數學以及建模的工具」，並且拒絕使用辯證法、迴避勞動價值論，而更為強調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理性選擇理論。不過，在他們這樣強調的同時，也正標示著他們已經站到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上。(Ware & Nielsen, 2002 : 1-45)

最近，全球化的議題則為馬克思主義者新的焦點。雖然學者們對於「全球化」的定義莫衷一是。首先，大量的以整個世界為範圍金融市場活動，使得各國政府權力縮小。其次，在跨國公司的驅策下，世界貿易大規模增加，形成一體化生產和分配體系。再其次，電視普及、資訊技術提高、電腦網路的發明、即時連絡世界各地的電子通訊技術而將人們的生活空間變形、壓縮，這些發展在在都鮮明地提醒，「全球化」具有的真實性與其間強烈的存在感。此外，全球性的市場亦助長一國內部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迫使人們重新思考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的預言¹⁶與其理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他

¹⁶ 這個預言是這麼說的：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因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內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摘錄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

們看到了美國在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並且宣告民族國家的終結，以及美國帝國主義統治時代的開始。但他們的論述與其說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不如說更像無政府主義，因為相對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將「經濟關係」看作是人類解放的主要障礙，「政府權力」對他們而言才是最主要的阻力。(McLellan, 2009 : 7-9)

第三節 中國學與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結合

在蘇聯垮台，東歐共產政權紛紛相應倒榻的同時，中國的共產政權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吳玉山即以比較政治經濟的研究方法，並採取制度分析途徑，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蘇聯的「重建」和波蘭的「震盪治療」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市場社會主義的產權結構以及通貨膨脹的壓力雖然在三個國家都出現，但因為政權型態與實質私有化的程度不同，使得中國和波蘭的經濟都能穩定發展，中國的共產政權甚至還因此在轉型中存活下來。相對的，他認為蘇聯卻因為無法處理惡性通貨膨脹而使得改革無法持續，不僅政府垮台，整個國家的經濟亦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吳玉山，1996 : 2-3) 這樣將中國的共產政權作為比較的案例之一，以不同的研究方法所進行的各種研究自一九八〇年代便已經逐漸受到重視，在比較政治學領域中為重要的一支。這樣的研究模式也在更早之前，即中國共產黨擺脫蘇聯的控制，開始自行發揮影響力時，同樣發生在馬克思主義研究裡。例如 Mark Selden 雖然同樣是比較蘇聯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但他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探討兩國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動員式集體主義）對農民帶來怎樣的影響、為社會主義的理論帶來怎樣的新詮釋，以及對於政權的正當性帶來怎樣的結果。(Selden, 1991 : 15-64)

此外，也是因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各個社會裡有著不同的發展，因而又形成另一種被稱作「後社會主義」、「後共產主義」的新研究模式，主張不應把社會主義視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亙古不變的真理，而是應該從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出發，「將社會主義的實踐與本土化、民族化的過程結合在一起」。因此，社

會主義必須調整、修正其理念和建制，以因應不斷轉變的現實狀況。(李英明，1995b：85) 姜新立(2004：178-212) 認同這樣的觀點，並且在詳細的考察中國的經濟政策、意識型態、政權的建立與鞏固等方面後，指出中國一開始是從《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的「中年馬克思」思想出發，配合列寧的「職業革命家黨」理論，自行發展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馬列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更是影響了之後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內容，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一個新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則為此類型研究的一支，而為中國學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交會點。根據中國學者的整理，在美國進行這樣研究的學者包含 Maurice Meisner、Benjamin I. Schwartz、Stuart R. Schram、Frederic Wakeman、Brantly Womack、Arif Dirlik、John Bryan Starr、Tang Tsou、Raymond F. Wylie、Rachel Walke 以及一九八〇年代研究中心向澳洲轉移後的重要學者 Nick Knight。這些學者採用文本解讀和哲學透視的方法，圍繞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的主題進行研究，以涵蓋意識形態、學術思想、民間文化三個層面，並囊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實現型式、代表人物、歷史進程等四個方面。(張靜、靳書君，2008：80-81) 但除了上述學者，尚有 Thomas Sheldon、Victor Lipit、Roderick Macfarquhar、Richard Pfeffer、Andrew Walder、John G. Gurley、David E. Apter、Tony Saich、Franz Schurman 等人¹⁷。而 Maurice Meisner 即是較早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中進行中國研究，並且在美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¹⁷ 名單整理自溫洽淦〈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蕭延中所編的《外國學者評毛澤東》四冊書。但此份名單還有些缺漏，例如 Peter Van Ness 與 Dorothy Solinger 即未被包含在內。

第參章 用馬克思主義寫中國的劇本—Meisner 的中國研究

站在中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交會點，Meisner 的中國研究可說是完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來進行，其中又以毛澤東為其研究的重點，對於毛澤東的思想與作為都有深刻的理解與詮釋，特別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使得 Meisner 享譽中西，因而在中國研究上佔有一席之地。相較之下，由於 Meisner 的馬克思主義相關研究並不多，對於馬克思主義學術社群的影響力則相對較小。然而，由於 Meisner 的中國研究大量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詮釋中國的共產革命與邁向共產主義過程中的實踐經驗，因而間接參與到馬克思主義長年以來的爭論，即關於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可能性、革命後社會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的面貌，以及上層建築與基礎之間的關係等課題，因此 Meisner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社群不無貢獻。故本章將以《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Mao's China and after :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一書的歷史時序為主軸，並以《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源起》(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鄧小平時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探循 (1978-1994)》(The Deng Xiaoping era :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以及新出版的《毛澤東之政治與知識的圖像》(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與散落在不同的期刊，再加上若干網路的文章內容為補充，整理 Meisner 的中國研究內容，與他在著作中所運用到的馬克斯、恩格斯、托洛斯基、列寧、毛澤東等人的理論，並將在小結中總結 Meisner 的特殊論點。

第一節 革命時期的中國

Meisner第一本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著作，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源起》。李大釗不僅是Meisner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起點，李大釗對Meisner而言亦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起點之一。他認為李大釗代表著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在關於吸收、運用、轉化外來的理論以面對中國內外交迫的惡劣環境等方面。針對李大釗受到俄國民粹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將兩者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的觀點，Meisner藉以闡釋民粹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往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¹⁸。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中，Meisner亦延續這樣的觀點，指出李大釗、陳獨秀於一九二一年創立中國共產黨，正代表著中國傳統的地主官僚菁英的後裔對傳統的反叛，進而形成新的、不代表舊社會任何階級的。他們「知識份子階級」，在經歷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的衝擊而對自由主義幻滅的階段後，投向馬克思主義的懷抱。然而，Meisner也注意到，這群新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實際上是出自於民族主義，希望藉此拯救中國，而與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內容和目標有著根本的矛盾。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未被這樣的矛盾所困惑，反而將民族主義作為革命的工具，其中又以毛澤東運用的最為出色。但毛澤東並非一開始就取得主導共產黨的位置，而是要到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遭受國民黨瓦解而被迫展開「長征」後，才逐漸取得領導地位。

一開始主導共產黨的，是由蘇聯所領導的共產國際。Meisner 指出在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下，中國共產黨被指示應先將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因此必須與國民黨合作，先實現民族統一和國家獨立的目標。但國民黨卻只表面地完

¹⁸ Arif Dirlik比Meisner更強調無政府主義對於李大釗的作用，並且質疑Meisner認為李大釗將無政府主義作為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以適應中國社會的看法。但無論是Meisner還是Dirlik的看法，皆隱含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存在著誤解的假設。對此，王遠義試圖重新論證李大釗對於馬克思主義並無誤解之處，反而因為對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與中國革命的洞見，而「超越(或稱違背)馬克思主義，主張中國當下毋須等候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成熟，可以、應當立即進行共產革命的理由與必要性」。(王遠義，2001：479-480)

成前述目標，未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反而極力維持現狀以滿足具有地主紳士身分的支持者。同時，亦展開毀滅共產黨的行動，而共產黨則爲了服從蘇聯的指示，壓抑而非結合當時已有蓬勃發展的群眾運動，最後在一九二七年遭到幾乎被摧毀的結果。但也因此使得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蘇聯並非革命智慧的唯一來源，自己應該保有政治和軍事上的獨立性；馬列傳統理論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特別是農民在革命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或許在中國會有不一樣的劇本。

Meisner 觀察到，殘餘的共產黨分裂成兩大陣營，一爲毛澤東與朱德領導，以農村爲革命根據地的路線；另一則是仍接受蘇聯的指示，希望在城市重新發展革命的路線，但在一九三〇年底徹底失敗，最後亦轉入農村。毛澤東在五年後因爲國民黨的再次進攻，而於共產黨開展「長征」的過程中，在兩派的鬥爭下脫穎而出，並且標示著中國的革命逐漸擺脫蘇聯控制的開始。而共產黨人在「長征」中所承受的苦難以及最後於一九四五年革命成功的經驗，強化了毛與其追隨著對於唯意志論的信念，認爲「人可以按造自己的觀念和理想改造社會現實」。同時在「長征」中所形成的「延安精神」，即不斷鬥爭、勇於獻身、自我批評、勤勞勇敢和大公無私等禁欲主義的價值觀，亦在建國後不斷被提倡。但 Meisner 認爲更爲重要的是，於此時期，抱持民粹主義的信仰的毛澤東，認可農民的力量，並使之取代無產階級、農村取代城市，成爲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而聯繫起這群長期受到地主紳士和國民黨共同壓迫農民的，是民族主義的熱情。

但這並不是說毛澤東或毛澤東主義者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講毛澤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關係，是就它們某些獨自顯露出來的、相似的革命思想方法和具有某些共同問題和困境而言的。」(Meisner, 2005a: 73) 這些共同問題和困境背後隱含的共同信仰，即相信人民（特別是農民）爲有組織的整體，有著自發的革命行動和集體潛力。因此，Meisner 注意到，不同於認爲組織群眾是革命知識分子才能勝任的列寧主義，毛主義主張黨的幹部必須「向群眾學習」，並且要當「群眾的學生」。民粹主義的思想，亦表現在將城市視爲「舊的資產階級腐朽文化的

殘餘和新的資產階級不平等的滋生地」，因此將革命寄託在「對農村的相對純潔和農民天生的社會主義（或可能轉向社會主義）傾向的信賴上」。（Meisner，2005a：94）對於經濟落後的高度評價也是民粹主義的理念之一，並且表現在毛澤東將「一窮二白」視為中國特有的革命優勢之上。民粹主義者與毛澤東皆認為，當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不僅會使得革命將僅能在「歷史重負下蹣跚行走」，更會使得革命精神將在道德墮落的社會中窒息。

這些信仰與理念相合的結果，成就了一場幾乎與城市和城市無產階級隔絕，完全依賴農民支持的「社會主義革命」。Meisner 指出，雖然「中國的革命進程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念、體系和價值觀念相去甚遠，但正是從這一進程中，（在許多方面）派生出對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目標獨特的、富建設性的作法。」

（Meisner，2005b：47）農村與農民不僅是革命的主導力量，使得城市的無產階級成為被動等待解放的群體；延安時期在農村中的實踐經驗，更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消滅城鄉差距、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等目標，而與馬克思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全面發展」的人相和。這些實踐經驗更進一步的影響革命成功後的中國，並且成為毛主義理論的核心，主導了往後三十年的歷史。

第二節 建國初期

在進入中共建國的歷史之前，Meisner 比較了中國與蘇俄的革命背景與建國環境，且這樣的比較也不斷的出現在他的許多著作裡。相較於對世界的共產革命有著強烈使命感的蘇俄，中國不僅在革命經驗上隔絕於蘇俄與世界，革命成功後的主要焦點亦僅放在完成國家政治上的統一、土地改革、經濟發展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Meisner 相信這樣的作為不但沒有背叛對革命的承諾，反而是符合了以民族主義為薪火的革命現實。再者，中國的現實環境也比俄國更有利於實現這些目標，中國面對的反革命抵抗很少，延安時期所培養的管理者很多，群眾基礎即佔全國人口八成的農民，並且在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援助下面對著較好

的國際情勢。然而，這些優勢卻無法抵銷掉中國在社會與經濟上的極端落後所面臨的困境。

Meisner 觀察到，面對這樣的困境，毛澤東與共產黨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將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本前提，並宣布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為建國原則，在經濟上節制而非消滅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但 Meisner 亦發現，這裡所指的「人民」與「民主」卻有著極為不同的解釋。「人民」指的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政治統一戰線，非屬這個聯合者則不是「人民」，應受到「專政」統治。「民主」除了傳統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意涵外，亦代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以及四個階級的政治代表的政治參與。共產黨則為無論革命前後都沒有太多作為的無產階級的代表，而非其主要群眾基礎的農民代表，並因此在革命後的國家具有最高的代表性與正當性，擁有治理國家的最高權力。共產黨更運用這樣的權力，建立公開的恐怖統治以壓制反對勢力，並且藉由三反、五反等「思想改造」的活動將擁有一技之長的菁英，政治化為能夠為社會服務的「人民」。

Meisner 的分析還指出，在經濟方面，共產黨吸取蘇聯的經驗，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控制但鼓勵擴大私人經濟活動，以加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一開始由於共產黨內部僅有農村治理的經驗，因而需大量仰賴城市中舊有的人才。這些管理人才大多是對國民黨治理國家失敗而深受其害，故對國民黨普遍懷有仇恨心態的窮人。但毛澤東始終「把城市看成反革命資產階級（他們被看做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或潛在的盟友）統制的堡壘，那裡通常是外來社會影響和思想腐蝕的發源地。」（Meisner，2005a：60）且共產黨在革命歷史中，城市居民基本上是以被動等待或接受農民革命者解放的姿態，而受到許多譴責。種種原因所累積的不信任，使得這些人才在城市的經濟發展取得成效後，被共產黨人取代。

在農村方面，Meisner 則觀察到共產黨實現革命時期的土地改革承諾，摧毀對新社會毫無用處的地主階級，並鼓勵從事小資本主義生產的農民個體戶所組成的龐大階級出現。但由於農村的發展政策，是出自於加速農業積累以爲工業發展奠基的目標，因此是以保持農業生產穩定爲前提，默許富農對佃農的剝削。此外，Meisner 發現土地改革的成功，不僅使得貧下中農裡新生了一批與中央政府有著密切連繫的年輕人從事政治事務，取代傳統士紳的功能；亦在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例如群眾鬥爭大會與公審大會）進行土地改革的過程中，使得農民得以直接地參與改變自身的生存條件，進而提高農民的政治效能感，最後將所有農民納入國家政治與國家市場經濟之中。

對於這些成果，Meisner 認爲「曾統治中國社會達兩千多年的地主階級的覆滅，標誌著一場重大的社會革命已經完成，但這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Meisner，2005b：85）並且引用馬克思的說法，指出「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現代化工業組織、以現代技術爲基礎的分工的高度專業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勞動的協作化模式，都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前提。……在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則社會主義只不過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平等』的『原始』和『粗糙』形式，它爲更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和更有壓迫性的政治專制開闢了道路。」（Meisner，2005b：98）Meisner 主張，中國一九五〇年代的發展大致符合這樣的分析。農業雖然因爲土地改革的成功而在產量上有著大幅度的提升，但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好轉，其經濟剩餘被國家大量掠奪至工業化與城市的發展上，城鄉差距不斷的拉大。但城市中的工人並非因此全部都能享有優渥的生活，其內部亦因每個人技術的高低而拉大薪資的差距，並且受制於管理階層而無法自主參與工廠的運作。工廠中受到壓抑的工人，其實正是整個社會的縮影，即普遍受到由政治菁英與技術菁英所組合的新官僚菁英壓制的人民。不同於過去「又紅又專」、「既是群眾的先生，又是群眾的學生」的「幹部」，這些新官僚菁英不僅是在群眾之上的，甚至還和被管理的群眾有著很深的隔閡。

Meisner 認為，原本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政治機構是一個在經歷內戰後徹底毀壞、因此由共產黨親手重建的官僚組織，進而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求革命勝利後應徹底摧毀而非接管舊政權政治機構，並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權的基本觀點。然而，無形的、存在已久的官僚思維和行為模式並不容易消失，反而在新中國藉由共產黨的列寧式組織結構重新獲得養分，並且逐漸壯大，成為受到職業和專業規範支配，而非社會主義目標與價值影響的新社會階級。Meisner 更進一步指出，在第一個五年計畫實施後，問題變得更加的嚴重，「在新的等級制和新型的社會不平等面前，舊的平均主義觀念徹底破碎。工業化要求嚴格的紀律、社會穩定和經濟理性，這使堅信群眾創造性的革命理念黯然失色。為了直接的經濟發展目標，社會主義目標正被擱置並被局部儀式化了。」(Meisner, 2005b: 107) 而使終懷抱著「革命理念」的毛澤東也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結果，並且將改變的可能性放在農村上，就如同革命時他對於農民的依賴那樣。

第三節 毛主席的中國

Meisner 批評，土地改革雖然帶給了許多農民夢寐以求的土地，但「並沒有帶給農村繁榮，也制約著國家現代經濟的發展。」(Meisner, 2005b: 121) 農村不僅要負擔國家發展城市工業化與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同時農村內部因為個體戶經營模式不利於規模經濟的產生與現代農業技術的採用，因此其生產率不如預期，僅能勉強趕上人口增長率。不過，Meisner 也觀察到共產黨在記取蘇聯的經驗¹⁹後，原先雖然並不急於解決這些問題，而打算採用謹慎的漸進式社會變革，讓農村透過組織互助組²⁰，將互助組合併為「半社會主義的」或「初級」的農業

¹⁹ 蘇聯的農村集體化經驗，其一指的是農業集體化的推遲將帶來農村的階級分化，並塑造出一批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富農階級。其二則是指集體化若是採自上而下快速推進的模式，則將有災難性的後果。(Meisner, 2005b: 127)

²⁰ 此為第一階段的集體化目標，互助組是由六戶或以上的農戶組成的季節性組織，土地仍為私有，但農民們彼此互相幫忙，並在擴大勞動單位的過程中培養集體勞動的模式，並在最後發展成長年的組織。(Meisner, 2005b: 122)

生產合作社²¹，最後將「初級」農業合作社整併為「高級」的或「先進」的農業合作社，徹底廢除土地私有制，完成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理想。然而，這樣的漸進式過程卻因為農村中快速滋長的農民個人主義與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而不得不加快腳步進入互助組的階段，以藉由合作化後生產量提高的優越性克服小農意識，以及提供更多的工業化資源。

然而，就如同 Meisner 所指出的，這樣的速度仍不能滿足懷抱著農村烏托邦理想的毛澤東，因而越過共產黨的集體決策機制，直接向群眾訴求，以塑造輿論壓力，迫使黨中央即使不同意卻仍要再將集體化進程加速到合作社階段。Meisner 主張，這樣從外部進逼黨中央的策略行動，正是毛主席的展現。以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為核心的毛主席，強調群眾的力量，並且相信群眾的意志可以被召喚，甚至可以被改變，最後還能以這股符合社會主義精神的意志，在脫離現實環境的基礎上，反過頭來改變社會，而不是被動等待社會改變後形成新的意識。因此共產黨應時時刻刻與群眾為伍，並且在革命之中不斷的進行自我教育，所以逐漸壯大的官僚主義是毛澤東所排斥的。此外，Meisner 亦指出，毛澤東強調集體化的目標不該只有為工業化的發展而設，同時還要照顧到農民的需求，為農村帶來社會和經濟利益，兩個目標皆不可偏廢。因此，為了達到遏制官僚化以及集體化的理想，毛澤東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展開了百花齊放、社會主義教育，並且在最後以文化大革命告終；在經濟上則在加快集體化的三個階段的基礎上，「大躍進」至共產主義階段的「人民公社」運動。而在這些運動的背後所揭示的理論，即毛澤東於吸收馬克思與托洛斯基的理論後，所提出的中國版的「不斷革命論」。

根據 Meisner 的研究，「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於一八五〇年面對一個資產階級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又不夠成熟的國家時，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他認為無產階級於革命後必須在各階級中取得主導權並施行無產階級專政，且以此

²¹ 此為第二階段的集體化目標，此時的土地雖然還是私人所有，但是由集體進行土地的經營耕作，收成或收益部分是按照勞動的程度分配，部分是根據當初各個農戶所提供的土地數量。（Meisner, 2005b : 122）

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再者，爲了避免無產階級受到資產階級的誘惑，因此無產階級必須「不斷革命」。這個理論被之後的經濟落後國家裡的馬克思主義者拿來作爲理論根據，一九〇五年托洛斯基即在此基礎上又往前跨了一大步。他認爲經濟落後的國家與先進國家相較之下，前者的無產階級更具有革命性與戰鬥性，因而彌補他們在數量上的弱勢，甚至得以在革命中取得領導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讓資產階級革命繼續，「不間斷」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並且進一步帶動西歐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先進國家革命成功後，則將回頭過來保證落後國家無產階級政權的生存，因此革命將會在世界各地不斷地進行。毛澤東則是在史達林以「一國社會主義」取代世界革命論的背景中，提出不斷革命論，但強調其版本的不同以避免被視爲當時受共產國際環境所排斥的托派同路人。(Meisner, 2005b: 180-182)

事實上，就毛澤東的理論而言，Meisner 認爲毛的確不該被視爲托派同路人，而是已經到了超級托洛斯基主義者的超越性層次。因爲 Meisner 注意到，毛認爲在共產主義實現以前，社會矛盾與鬥爭會持續存在於整個革命進程，要解決這些矛盾，唯有不斷地以革命突破既存的現實；但解決後的平衡只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的情況才是經常的、絕對的。革命必須同時進行經濟與社會改造以及思想改造，以確保群眾在發揮生產積極性的同時防止資產主義復辟。因此，毛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觀點，認爲物質生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並沒有「一個嚴格界定地、或多或少滯後的社會政治發展階段」。以中國的情況而言，反而是政治和社會的變革快過於經濟發展的變革。Meisner 還認爲，毛相信，正是因爲每個人能夠以正確的思想 and 道德價值觀來武裝出堅定的意志，因而克服了一切的物質困境，使中國完成這些變革。但這並不代表「毛幻想著原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能夠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生存」，毛仍相信「經濟和普遍繁榮是共產主義未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單靠現代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然而，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重要前提進行否定，且

馬克思也曾經警告過：「人們爲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靠粗俗之徒所臆測推斷的，可以依靠『地上的寶藏』，而是依靠前人創建但也正在沒落的文化成果，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只是，對毛而言，這些文化成果正是他想要卸下的，並且相信著「決定歷史發展結果的根本力量是主觀因素」。(Meisner, 2005b : 182-188)

Meisner 指出，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大躍進期間的口號理所當然地即是「人是決定性的因素」、「人比物更重要」，以及「主觀可以創造客觀」等。政策行動上則是將過去偏重重工業發展的政策，改變爲發展勞力密集型的農業、輕工業、小型企業以調和城鄉差距和解決失業問題；但重工業的發展並未被放棄，因此農村的勞動力於農閒時仍被充分地利用來發展當地的小型工業，加速原始社會主義的積累，以支持重工業。此外，Meisner 還觀察到，爲了改變過去只有少數人掌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特權現象，工人和群眾被鼓勵要透過邊做邊學的方式，以使知識普遍化，並且讓廣大的人民能夠「又紅又專」。也因爲這樣，被視爲在理論上自主自足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統一的人民公社，成爲主要的變革載體，承擔著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以及最終將廢除國家的國內職能的任務。這些政策所呈現的經濟改革成果，可見於農村的集體化政策在一開始所達到的成效，特別是在提升農業技術知識的普及以及減少農村內部的不平等方面。但是農村集體的獲益實際上是有限的，因爲在缺乏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之下，無法興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出來的產品，大部分的收穫又被國家拿走以提供城市的糧食供應和工業化的資金；再加上之後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與經濟危機，使得一九五六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農民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沒有增加。(Meisner, 2005b : 136-137)

Meisner 批評，與經濟改革同時開展的社會與政治方面的改革政策，同樣地未能達到預期的成果。一九五六年在科學家之中所施行的「百花爭鳴」運動，以

及在作家和藝術家之中所施行的「百花齊放」運動²²，一開始的確在毛的帶領與保證下，引發了許多有意義的批評。知識份子們甚至在雙百運動中批評共產黨背叛社會主義，並且成爲一個「新階級」，加大了社會的不平等；他們亦提倡社會主義民主，主張讓群眾自己管理政治與經濟生活、監督國家和黨的機構，以遏制官僚主義、防止新階級形成，最後實現真正的社會平等。Meisner注意到，雖然這些批評與毛主義有許多類似之處，並且在之後被毛澤東用來作爲批評黨內官僚的主要論點，但由於毛無法接受自由和民主的觀點，並且認爲高度團結的人民應該懂得「自由」不能超過社會主義「紀律」的界線，「民主」應該與「集中」互相結合，因此這些跨越「紀律」界線的知識份子們最後被戴上「社會主義的敵人」與「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整治。不過，Meisner認爲這個運動對毛而言仍然帶來一些很好的成果，亦即毛成爲得以自外於黨的「人民革命領袖」，並以人民代表的身分對黨提出批評，以「思想決定論」作爲審視黨內外所進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的標準。（Meisner，2005b：161-174）

Meisner 指出，毛澤東在雙百運動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揮出更大的效用。但在此之前，由於大躍進的失敗，使得黨內官僚得以短暫復辟，毛則暫時被迫退出政治舞台。Meisner 稱此爲「熱月的反動」，並分析官僚的復辟，其實有著客觀歷史條件的支持。例如當時的中國仍屬於經濟落後的農業社會，各階層的力量都相當弱小，即使是宣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兩者之間的聯繫亦相對少，無法給予數量仍少的無產階級更多的力量。再者，相對於民主傳統的缺乏，中國擁有著長遠的官僚歷史傳統；雖然共產革命的成功一度打擊了官僚文化，但長期飽受政治動亂和貧窮折磨的人民，爲了追求經濟快速發展以及政治生活的穩定，使得政治集權化有其必要性，而有產階級的滅亡正好讓出了這樣的空缺給新官僚。大躍進雖然使官僚化中斷，但大躍進的失敗使得人民退回純粹

²² 會有這樣的區別，是因爲共產黨認爲自然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此可以提倡和探討不同的觀點，以促進科學的進步。但藝術作品、文學作品、歷史和哲學是具有階級性的，在一個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的國家裡，必須以爲人民服務爲宗旨，受到政治上的監督。（Meisner，2005b：154-155）

為生存掙扎，無心甚至厭惡政治的情緒中，因而給予官僚復辟的機會，全面恢復了黨對社會的控制，並且成功地讓城鄉經濟回復穩定，生產量逐步回升。

(Meisner, 2005b: 229-232)

但 Meisner 還觀察到，毛澤東對官僚的厭惡，以及打擊官僚的決心並未受到大躍進失敗的影響。尤其是當黨的新經濟政策在讓經濟進步的同時，也讓官僚和技術菁英集團再現、城鄉差距再度拉大、工農內部因技術高低而出現不平等的情況時，使得毛澤東憤怒地公開批評黨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也因此在意識形態上產生質變。他並且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組集體主義精神。但這些主張最後受到黨的領導人與整個官僚體系的抵制，並在最後導致失敗的結果。(Meisner, 2005b: 241-265) 對於毛澤東反對官僚的思想，Meisner 分析，相較於馬克思認為官僚是「各種社會弊端的產物」，毛澤東則是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認為官僚是「外加於社會的弊端，也就是社會邪惡和不平等的根源」。且亦相對於馬克思不認為官僚是一個階級，毛則明確地指出官僚已成為一個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與「資產階級」同義，因此「官僚統治等於是『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統治，或至少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根源」。(Meisner, 2005b: 238)

Meisner 的研究顯示，為了徹底顛覆官僚主義，毛在經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失敗後，決定如同發動大躍進那樣，越過黨的集體決策機制，號召群眾發起「文化大革命」，對黨發動全面的攻擊，但也因此成就了一場「他漫長革命生涯裡的最大悲劇——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幸的後果」。(Meisner, 2005b: 271) Meisner 會對文化大革命做出這樣的結論，是來自於他對革命的目的與結果的詳細考察。他指出，雖然文化大革命是以「人民民主原則」作為號召群眾團結的旗幟，以打倒官僚、破除傳統迷信、培養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為目標，並且企圖重新豎立社會主義的精神。但人民始終未能自己作主，而是打從一開始就臣服在毛澤東

的意志之下，同時亦建立了對毛的神話式崇拜²³。於文革期間組成紅衛兵的年輕人，在當時互相爭鬥而未能團結一致，文革末期亦在以毛澤東為首的官僚集團背叛下，成為「失落的一代」，對政治不再關心。官僚雖在文革期間遭到全面的打擊，但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官僚化的軍隊系統，共產黨與整個官僚體系亦在文革後全面復活，並且在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信仰危機」的氛圍下，帶領人民快速地資本主義化。由此可見，「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動亂產生的實際結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且「毛的意圖與他面臨的環境之間的衝突，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悲劇的核心」。(Meisner, 2005b: 273-274)

因此，雖然 Meisner 借用了馬克思「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的，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的」之名言，但對 Meisner 而言，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一場鬧劇，而有其新意義的悲劇。Meisner 更進一步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所揭示的態度來尋找這場前所未有的革命意義：

當人們好像剛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新的一幕。(Marx, 1995b: 273-274)

而Meisner最主要的切入點，即文革期間重新在歷史的塵埃裡翻出的巴黎公社體制。雖然在建國初始，毛主義的理論並不接受巴黎公社體制中所宣言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而以「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聯合專政²⁴」取而代之。但隨著共產黨所組成的官僚系統逐漸強大，使得馬克思從巴黎公社所體認到的中心思想

²³ 毛在 1965 年與 1970 年兩次承認了個人崇拜的存在，但毛卻將個人崇拜與「三千年來崇拜皇帝的傳統」連繫起來，亦即「利用文化落後的條件來使自己的權威神祕化，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所以個人崇拜雖然是一種「人民社會權力異化的極端表現」，使得人民將毛視為「集體意志和全部智慧的具體化身」；但於此同時，個人崇拜亦為「動員群眾反對統治他們的官僚機構、反對權威合法化的主要武器」。然而，在文革後期基於重建共產黨的需要，在邏輯上有必要減少對毛的個人崇拜，因此從 1971 年開始，個人崇拜藉由黨章的修改以及強調的黨的重要性，而逐漸緩和下來。(Meisner, 2005b: 358)

²⁴ 即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階級等四個「民主階級」的聯合。

—打倒中央集權式的官僚軍人國家機器，把國家所篡奪的全部權力歸還給社會—
成爲毛主義理論中新的一部分，並且藉用馬克思的權威，宣揚「無產階級專政」
爲通往共產主義社會的關鍵。所以，與巴黎公社相呼應的「人民公社」於大躍進
期間失敗後，在上海再次出現²⁵，並以平等主義、反官僚主義以及毛主義核心信
仰—相信群眾自發的革命首創精神爲主要的推動力。於此同時，毛亦運用馬克思
在分析公社時的反傳統傾向，即主張「以革命方式砸爛舊的社會經濟秩序與政治
秩序」，使人民的能夠藉由此精神的轉變成爲「一批掙脫了舊的習慣觀念的『新
人』」。而馬克思在分析公社時，所展現的對革命英雄主義行爲、獻身精神和自我
犧牲的禁欲主義價值觀，更因爲與毛主義中的「延安精神」相合，於文革期間受
到大力推崇。(Meisner, 2005a: 126-139)

雖然毛於文革期間借用許多馬克思於分析巴黎公社時所展現出的觀點，但
Meisner亦指出毛澤東與馬克思理論上的根本分歧。他認爲，對馬克思而言，無
產階級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並且領導著農村生產者，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
完成指定的歷史使命。但毛澤東卻將所有「具有無產階級覺悟」的人們皆視爲無
產階級，並且將革命的希望寄託在農民而非無產階級的身上，特別是農村所建立
起來的人民公社。此外，雖然毛具有明確的反官僚主義傾向，但對於國家與社會
的關係卻持相當模糊的態度，因而不大能接受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異化²⁶的分
析。但Meisner認爲，這些分歧並不能掩蓋在文革期間馬克思對於公社的觀點因
爲毛澤東而重新復活的事實，並且因此在一個時期內阻止現存社會與政治現實制

²⁵ 上海人民公社於1966年底有著短暫的存在。Meisner認爲此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
真正的無產階級登台時刻。但隨著由革命群眾、黨幹部、軍隊三者所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取
而代之，不僅顯示毛對於工人根本上的不信任，亦代表著人民的政治權力最終還是被行政權力所
取代，且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行政權力面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而領導著行政權力
的是在人民崇拜的基礎上，所建立的毛澤東個人權威，僅毛一個人，就可以決定整個社會運動的
命運，造反權力非人民所故有，而是隨時都可以由毛賦予、收回的權力。(Meisner, 2005b: 302-309)

²⁶ 「國家異化」就Meisner的理解，即指以官僚爲代表的國家作爲社會的產物，卻凌駕於社會之
上，與社會分離，進而對社會生活進行絕對統治。Meisner更進一步批評文化大革命末期讓官僚
復活，因而未能產生普遍的民主政治體制，「使勞動群眾掌握生產資料，在發展現代生產力的同
時，使勞動群眾自身獲得社會經濟上的解放，從而使整個社會獲得解放」，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
失敗。特別是，對照毛主義所強調的「政治上層建築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起
著決定性的作用」之觀點而言，這樣的失敗非常明顯。(Meisner, 2005b: 342-345)

度化的傾向。然而，更重要的意義是，毛澤東因此被「確立為馬克思的真正繼承者」，並且是「來自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這種傳統不僅容許而且要求徹底背離現存社會，以便創造一個激進的新世界」。(Meisner, 2005a: 140-143)

然而，Meisner 主張，事實證明，這個激進而不受控制的新世界真的實現時，毛無法受。毛最後還是選擇恢復秩序，但恢復的是由毛所控制而非過去的官僚所控制的秩序。而那些未能即時跟隨毛的腳步走向中間的人們，相對地成為「極左份子」，甚至在軍隊全面鎮壓整肅的期間，轉而被指控為「形左實右」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文革初期所採用的以「政治行為」作為劃分階級的標轉被廢置，轉而重新採用舊官僚所訂下「社會階級出身」的審查標準，以「清理階級隊伍」。同樣的，在文革初期備受攻擊的列寧主義亦在文革後期被重新啟用，並用來作為重建共產黨的理論依據。(Meisner, 2005b: 309-322) 黨因此恢復至高無上的地位，並與軍隊、國家成為三位一體的官僚機構，「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似乎在兜了一圈後，又使人民共和國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的起點，政治權力復歸三年前的狀態」。(Meisner, 2005b: 327)

但隨著林彪的垮台，軍隊退出了這三位一體的權力中心，變成接受黨的領導的「槍桿子」。Meisner 發現，過往許多被廢置的理論與政策紛紛被再次啟用，連帶著原本被抑制的社會不平等又再度地拉大。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以及江青所組成的四人幫，雖在毛有意識的鼓勵下，再次宣揚巴黎公社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理念，宣示要糾正這些「右傾」的政策，但由於他們有限的政治權力，使得風暴未能擴大。然而，Meisner 指出，由於四人幫強調馬克思主義中獨裁的一面，要求國家需加強專政和鎮壓功能，並以秘密警察作為任意實行專制鎮壓的主要工具，因此掀起政治恐怖的巨浪，使得知識份子即使到了文革末年仍然受到許多殘酷的壓迫。原本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隨著舊官僚復職浪潮而逐漸返回政治核心，甚至被認為是周恩來接班人的鄧小平，亦再次的成為攻擊的對象。然而，隨著「在

思想和政治上成熟於五四時期的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²⁷」們先後去世，他們所代表的歷史使命也在毛澤東去世的同時正式畫下句點。(Meisner, 2005b: 367-375)

第四節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儘管現在流行的觀點認為「毛爲了『意識形態的純潔』而犧牲了『現代化』發展」，但 Meisner 指出我們不應該忽略革命所帶來的成就，而應該認清一個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在經濟現代化上的成就遠遠勝過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就」，並且毛所領導的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時代，他並未因爲追求「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而忽視經濟發展。即使農業生產增長緩慢，工業內部也存在著「浪費、低效、人浮於事、官僚機構膨脹、生產率低下以及腐敗」和技術落後等問題，但毛留給後人的，是一個沒有外債與通貨膨脹、教育事業發展良好、醫療衛生體系相對於過去的歷史更爲普及的社會，進而爲社會主義創造重要的經濟前提。(Meisner, 2005b: 384-388) 然而，毛卻未能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所有制」，而是「國家所有制」；並且以「社會主義民主」的口號企圖壓抑「中國人民享受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樣一些基本的民主自由的要求」，使得馬克思所指的「國家自行消亡」的舊夢在未來成爲一個虛幻的烏托邦。(Meisner, 2005b: 391-392)

在鄧小平再次復出後的「社會主義民主」，Meisner 認爲其內容與西方所認知的「民主」有著更大的差距，即使他是在一九七八年民眾的民主運動中獲得新生的力量。且隨著鄧小平權力的逐漸擴張，他對於這些年輕的民運積極分子們的容忍度相對的卻持續下降，尤其當他們「批評黨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壟斷，否定黨

²⁷ 對於這些人，Meisner 有著極高的評價，他稱許這些革命家是「現代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最富有革命生氣的革命領導人，因爲他們領導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也是最落後的國家開始了現代變革……在極其可憐的物質基礎上，他們把中國改造誠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奠定了現代工業經濟發展的基礎」，因而將會被歷史學家以「最著名的、最富有理想的革命知識分子」爲名，記載於史冊之中。(Meisner, 2005b: 375)

在思想上絕對正確」，並且重新提起已被視為不正確的文化大革命「極左²⁸」理論，指出新生的「官僚階級」正在統治中國時，更使得他們自己無法見容於政府。因此，從一九七九年起，鄧小平領導的政府即開始了對民運的鎮壓，並指責這些昔日的盟友為無政府主義者。毛澤東提出的「四大自由」被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所取代，亦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以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原則被鄧小平拿來再三的強調，同時也是唯一一項始終為政府所堅持的原則²⁹。(Meisner, 2005b : 402-406) 而在這樣的原則下所施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因而指的是以列寧主義作為重組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並且「通過黨的幹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使黨的統治更加制度化和規範化」。(Meisner, 2005b : 417-418) 既然如此，面對一九八九年規模更大的民主運動，由鄧小平領導的共產黨中央回報的即為殘酷的鎮壓，且在「波蘭恐懼症³⁰」的籠罩下，對工人的鎮壓尤其殘忍，並進一步壓抑任何工會自由組織的可能性，以持續為市場提供工資低廉、有紀律的勞動大隊。(Meisner, 2005b : 507-508)

在經濟改革方面，Meisner觀察到，由於鄧小平與其支持者藉由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強調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前提，並且進一步指出中國在革命後已

²⁸ 在鄧小平開始以後的時代裡，所謂的「左的傾向」或「極左」，指的是以消極的態度面對經濟改革政策，並且經常被拿來指控政府的敵人。(Meisner, 2005b : 407)

²⁹ 在被放棄的原則中，最令新政府感到棘手的，即為對毛澤東思想的重新詮釋以及對毛澤東的重新定位。相較於能夠以列寧作為取代史達林地位的蘇聯，中國共產黨若選擇全面否定毛澤東，則將會使得共產黨國家的政治合法性，以及革命的道義合法性受到根本的動搖。因此，在經過長達 15 個月的準備，共產黨謹慎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提出了「三分錯誤，七分正確」的評論毛的公式。正確的部分，指的是毛成功的領導革命，以及建國初期對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發展的功績。錯誤的部分則是指他在最後 20 年因為思想的「左傾」，因而造成了大躍進的經濟災難，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但整體而言，毛「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對於這樣的評價，Meisner認為不只是出於共產黨維持其革命連續性與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亦是出自於老革命黨員對於毛發自內心的尊崇。(Meisner, 2005b : 407-414)

³⁰ 代指對於任何類似由工人和知識份子所結合的組織團體，可能會危及政權的恐懼。但Meisner觀察到中國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因為中國的知識份子實際上並不關心工人，即使是 1989 年民主運動中的學生亦於一開始將工人排斥在外，以避免工人加入後會製造出他們無法控制的暴力事件，進而使得政府有鎮壓的藉口。但隨著政府越發強硬的態度，以及大批解放軍進入北京，促使學生轉而尋求工人的加入與保護。最後，工人成為這波民主運動中，犧牲最為慘烈的群體；學生相較之下則受到較寬大的處置。(Meisner, 2005b : 473-476、507)

不存在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相對於被緊握在政府手裡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則是大幅度地下放到地方政府甚至是人民自己的手中。但Meisner認為，下放的方式並非是以社會主義的手段，使生產者能夠直接擁有支配生產條件與產品的權力；而是引入市場經濟的概念，以打破「僵化的中央計畫經濟體制」，進而使生產力能夠快速發展，最後將奠定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根本的物質基礎³¹。實際的政策則是以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降低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投資為主要原則，開始各方面的經濟改革。例如在農業方面，政府收購農產品的價格被大幅提高，農民自留地亦增加了百分之十，農村集貿市場的交易亦被政府所接受，因而成功地促使農村經濟的商業化，並表現在「鄉鎮企業」的大量出現上。Meisner還另外發現到，新政府也打破過去毛所堅持的「自力更生」國策，大量引進外資與技術，並增加中國對外貿易量，而南部沿海的「特區」即為因應此改變所設立。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回到了過去的半殖民地狀態，因為革命後的中國，已成為「一個由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領導人領導的強大國家」，因而得以捍衛中國主權的完整。只是，Meisner亦注意到，西方資本主義手段和技術的引入，一定程度打擊了中國的民族自信心，產生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最後則將導致反面的民族主義，引發強烈且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Meisner, 2005b : 419-434)

事實上，Meisner 主張，鄧小平死後，繼位的領導人正是支持民族主義的主要力量，以填補虛幻的社會主義外殼下的意識形態真空，並且在最後成為中國唯一的意識形態。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更是讓中國的民族主義進入高潮的階段，中國的統一僅缺少台灣這一塊。但 Meisner 認為，由於台灣在軍事上與政治上並不存在獨立建國的客觀條件，其現有的準獨立地位完全依賴著美國的軍

³¹ Meisner分析，新政府之所以不願意採取社會主義的手段，有兩個重要的原因。其一是長久以來對社會主義形成的扭曲概念—認為「國家對生產的支配誠度」為社會主義的衡量標準，促使本來就相當排斥「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中央計劃體制」的新政府不願意採用該手段。其二則是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手段，亦即生產者直接支配生產進程的方式，必須以政治民主為前提，因而將會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權。(Meisner, 2005b : 418)

事保護；然而，由於美國不可能永遠保有軍事優勢，因此「和平統一」是台灣所有選項裡最為明智的一個。只是，統一的可能性被期待是建築在「中國與其史達林的過去徹底決裂、開始進行意義深遠的民主改革的基礎上」，並且需要尊重「台灣獨特的現代歷史」、「給予台灣充分的自治權」。(Meisner, 2005b: 491-497)

總結來說，Meisner 認為，面對後毛時代經過巨大變革的中國社會，由於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因而不能稱作資本主義社會；但也由於國家取代勞動群眾支配產品和生產條件，因而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故 Meisner 將其定義為「後資本主義」或「後革命社會」。(Meisner, 2005b: 393) 在這樣的新社會裡，是以「官僚資本主義」為主要發展核心，擁有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官僚與其後代，在這個社會裡牟取巨大的私人利益，並且逐漸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有可能在未來抵抗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式變革；更由於他們緊緊依附於共產黨的政權，缺乏獨立性的他們也不太可能會如同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成為推動民主政治改革的動力。(Meisner, 2005b: 435、440-444) 能夠成為中國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動力的，將會如同馬克思所預言，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最為害怕的無產階級。這並非是固執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教條而下的結論，而是根植於中國的現實—受到資本家長期剝削且為數最多的無產階級，對於作為推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將構成最大的威脅，因為正是這個宣稱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透過建立一系列的資本主義式改革，使無產階級的隊伍擴大，並且陷入巨大的社會不平等所帶來的痛苦。Meisner 亦指出，若馬克思的預言實現，則將會是「歷史上最大的嘲諷」。(Meisner, 2005b: 502-509)

第五節 小結

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譯者杜蒲眼中，Meisner 不同於一般西方的研究者多著重於歷史人物性格及其私生活等較為推測性的解釋，而是相當尊重官方所公布的資料，並輔以他們的實際作為進行對照，最後再

運用自己所理解的理論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做出綜合性的討論與評價。也因為如此，每當有新資料出現時，就會威脅到 Meisner 原本的解釋，對於他這樣一個嚴肅的批判家與歷史學家而言，是一段相當痛苦的歷程。例如他對資本主義在中國表現，即從一開始在第一版謹慎地指出中國經濟體制不像傳統的資本主義，到第三版直接失望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資本主義的主要推動者。在其他的著作裡，雖然較不需要進行改版以顯示出不同的態度，但隨著出版時間的先後，也可以見到類似的痕跡。例如在出版較早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一書裡，毛澤東的形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不失理想性的，但到了近年出版的《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裡，則在保留毛澤東的理想性一面的同時，又新增了橫暴的一面，因而更貼近近年來對於毛澤東的普遍認識。

然而，即使有這樣的轉變，但 Meisner 對於其研究核心—毛主義，卻有著不變的堅持。首先，他特別強調毛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相似性，並且表現在反覆陳述毛漠視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前提、無產階級非社會主義主力，以及主觀可以改變客觀的三個主要觀察上。(Meisner, 2005a: 58) 其次，Meisner 雖然高度評價中國的革命，以及革命後共產黨所進行的社會變革之偉大，但仍以共產黨和農民的高度連結，將其定義為一個表面上雖宣稱代表無產階級，實際上卻是代表農民的政黨，並進一步將 1949 年的革命視為農民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最後，Meisner 雖然理解毛與其追隨者面對中國落後的環境與社會主義理想之間的矛盾之窘境，但仍指出毛以「唯意志論」的思想取代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環境的強調，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悖離的。不過，對於這樣的差異，Meisner 並未將之視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反而將其評價為延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有意義的新嘗試。因此，整體而言，Meisner 給予毛澤東相當高的評價，並且超出中國共產黨所願意接受的，將「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提升到「毛主義」。

也因為這樣，Meisner 對於毛後的中國的失望溢於言表。雖然他試圖相信鄧

小平所宣稱的——資本主義的手段是在為社會主義目標服務，只是這個目標被推遲到遙遠的未來而已。Meisner 甚至還詳細的考據了鄧小平的理論，並將之視為與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連結，亦即重新承認到資本主義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基礎的重要性。但對於逐漸反客為主的資本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手段與目標巨大的分裂，使得 Meisner 雖然承認中國高度且驚人的經濟發展，但仍在考察中國於鄧小平施行經濟改革後對社會所造成的高度不平等，以及官僚體制作為資本主義的主要推手之後，將鄧後的中國做出相對較低的評價，並且期望著未來的中國人能夠實現「社會主義以及作為其本質的民主先決條件」。

由此可見，Meisner 雖然不固執於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但本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特殊理解，包括強調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以無產階級作為生產資料所有人並且參與生產計畫的社會主義式民主，以及相對地對官僚組織的排斥，使得他在詮釋共產中國的歷史時，有著特殊的見解與評價。而這樣的歷史詮釋，也使得他必須面對抱持不同意識形態，甚至同為左派陣營但對馬克思主義有著不同理解的攻擊。下一章即將討論這些論戰，以更進一步理解 Meisner 的理論架構，以及他在整個學術社群中所佔據的位置。

第肆章 劇評——對 Meisner 研究的評價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尤其是特別關注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轉變的歷史學者，照理說他必須同時面對來自中國研究社群與左派學術社群的兩套學述脈絡。然而，畢竟 Meisner 的研究較偏重於歷史，即使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亦有相當研究，但也多集中於討論中國共產黨革命或建國時所採用的相關理論，而較少直接參與馬克思主義中的辯論；以至於在無關中國研究的左派理論文獻少有針對 Meisner 研究的回應。不過，對於自詡為「左派」的中國學者，且依造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理論體系，對於其他的左派理論有著獨特視角的他們，面對 Meisner 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相當關注，亦有許多批評。這樣不同的態度所延伸出來的，是 Meisner 在中西有著不同的歸類。對於中國學者而言，Meisner 可以被包含在一個中國所獨有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社群之中，但在美國並沒有這樣一個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名的研究社群，而是一概歸屬於中國研究的學術社群。

Meisner 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兩面性，受到來自美國的中國研究社群與中國之馬克思主義學術社群的關注。而美國的中國研究社群內部則又因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同時又分裂為左右兩派，並且亦相當關注 Meisner 的研究。正由於 Meisner 是以其獨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研究中國的主要框架，因此難免要挑戰其他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學者所仰賴的理論，同時亦須對不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提出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不同詮釋。他作品中這種兩面作戰的性質，在《Modern China》期刊上一次毛澤東研究的論戰所凸顯，這次論戰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

因而進一步引發中國學者對於毛澤東研究的自省，因此值得特別重視，本章倚該場論戰為核心起點，進一步並整理其他中、西方學者對於 Meisner 的評論，最後則將總結這些評論，全面性地觀察 Meisner 在學術上的位置。

第一節 Modern China 的論戰

Meisner 最活躍的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正是學術界對於過去「西方中心觀」進行反思，並且重新考察毛澤東思想的獨特性的時刻。他們主張毛澤東的思想並非是列寧主義的翻版，並且有其獨特性。但這樣的主張亦帶來了新的問題，即毛澤東的獨特性被過分誇大，甚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有著對立的關係，毛澤東思想甚至更進一步被獨立成「毛主義」。其中，Benjamin Schwartz、Stuart Schram 和 Meisner 就是主張毛澤東思想可視為是一種毛主義的代表者。（侯且岸，2000：382），他們受到來自中國研究社群內部左右兩派的夾擊。右派者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即指責他們是「毛的辯護者」；思想上相對較左的研究者則批評他們之所以會對毛澤東思想做出獨特性的評價，是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缺乏嚴肅研究」。（尙慶飛，2008：65）有關左派對於 Meisner 所處的知識社群所進行的攻擊，即以《Modern China》為主要戰場。

《Modern China》是西方中國研究中最重要期刊之一，這場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七年十月期間的圍繞「馬克思與毛澤東之關聯性」的討論，是西方毛澤東研究史中經典的四場論戰³²之第二場。這一次的論戰是始於Richard M.

³² 第一次論戰始於 1960 年 1 月 Karl August Wittfogel 在《The China Quarterly》上對 Benjamin I. Schwartz 的著作《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所展開的批評，並以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關連性進行辯論。第三次論戰則是於 1982 年在蘇聯的《遠東問題》上進行，主要是蘇聯學者對於美國心理學派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單方面批評，而未有相對的回應。第四次論戰則是在前三次的論戰所建立的基礎上，再加上中國公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學術研究所造成的衝擊，使得此次論戰可說是對整個毛澤東研究的歷史進行全面性的總結與反思。（尙慶飛，2008：54-128）此外，在《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亦有一場相關的論戰，但由於本文主要關注的是 Meisner 的研究，因此不詳細討論其他四次論戰，而是集中討論與 Meisner 有著深切關連的第二次論戰。

Pfeffer所發表的〈Mao and Marx in the Marxist-Leninist Tradition: A Critique of "The China Field" and a Contribution to a Preliminary Reappraisal〉一文，對於以Benjamin Schwartz、Stuart Schram和Maurice Meisner為主的「中國研究知識社群」(the China field) 研究者所進行的批判。Pfeffer批評這些研究者受到中蘇對峙政治氣氛的影響，因而對毛澤東有著錯誤的認識。他們從對馬克思的思想傳統進行機械化的描述出發，強化毛的性格與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進而錯誤地將毛澤東的思想與列寧主義進行過度的連結，因而忽視了毛澤東思想本身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以及中國實現馬克思最終目標的可能性之影響，最終導致了毛澤東思想偏離馬克思主義，甚至可說是馬克思主義裡的「異端」之錯誤論斷。(Pfeffer, 1976: 421-422、437-439)

雖然 Pfeffer 對「中國研究知識社群」有這樣嚴厲的總體評價，但相較於對 Benjamin Schwartz 和 Stuart Schram 的批評，Pfeffer 對 Meisner 則有著較為和緩的評論，並且認為在部份論點上 Meisner 超越了 Benjamin Schwartz 和 Stuart Schram 的研究，對中國的革命有著較深刻的觀察。例如 Meisner 注意到客觀的社會經濟力量的存在，以及意識和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因此，雖然中國最初所接受的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但卻接受了更具彈性的「最初的」馬克思主義，且相較之下更「具有辯證邏輯和歷史唯物論的哲學」。也因為這樣，即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李大釗還是毛澤東——均相當強調人的意識所起的作用因而有悖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但卻是符合馬克思本人所採用的理論研究途徑的。(Pfeffer, 1976: 428)

Meisner 的其他創見，即指出毛主義與民粹主義、烏托邦主義之間的相似處。他認為毛澤東成功的將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以使得經濟落後、農民為主要人口的中國，出現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且這樣的作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邏輯的。針對「中國研究知識社群」所忽視的烏托邦主義，Meisner 雖然不滿他們以毛澤東性格的轉變來解釋具有烏托邦色彩的大躍進政策，但他同意毛澤東的思

想在一九五五年經歷了很大的轉折，並且有著越來越濃厚的烏托邦主義的成分。只是，Meisner 認為烏托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所有偉大的革命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即指望著一個美好的未來，因而即使毛主義與烏托邦主義有相當關連，也仍符合馬克思主義。但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人「只能在他們所繼承的歷史條件範圍內創造歷史」；毛澤東則相信一個「具有新道德的『新』人是新社會的創造者」，並不必受到其所處現實社會環境的限制。Pfeffer(1976:428-433)認為這是 Meisner 的創見，有助於讀者認識到毛澤東並未被限制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內，並且還可以從其他非中國傳統所故有的思想體系來理解與評價毛澤東的思想。

不過，Pfeffer批評Meisner太過於強調毛澤東的主張與民粹主義的關連性與意志論，即使Meisner有注意到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和思想範疇上的努力，但卻因為過於重視前者，而掩蓋了後者的重要性。(Pfeffer, 1976:430)此外，Pfeffer亦反對Meisner對於毛澤東「不受限制的烏托邦主義」之正面評價，Pfeffer指出毛澤東只是不接受馬克思與正統馬克思主義所設定的限制，但他接受「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歷史條件對革命所加的限制」，因而提出「不斷革命論」作為面對此限制的理論方針。對工業化的重視亦可證明毛澤東並非是烏托邦主義者，且毛澤東就如同馬克思所主張的那樣，不認為工業化可以自行產生共產主義新人。簡言之，共產主義雖然需要工業化為之打造一個物質豐富的基礎，但共產主義的理想不一定需要等到這樣的基礎穩固後才可以實現。此外，Pfeffer亦指出Meisner用來佐證毛澤東具有烏托邦主義思想成分的言論，很多時候不過就是用來做政策宣導的修辭，因此常會有誇大的，或類似千禧年預言式的言詞。且即使是類似千禧年的預言，也有證據可以證明這樣的預言是與革命現實有所關連的，而非純粹是烏托邦式幻想。因此，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策是實際的、有目的的，故不該被指為空想的。將毛澤東視為烏托邦主義者，其實正是反映Meisner與其他有相同主張的人「不相信馬克思對人和人類社會未來的可能性的

觀點」，且這樣的觀點是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因而難脫政治涵義³³。(Pfeffer, 1976: 433-437)

之後 Andrew G. Walder 所發表的〈Mar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Mar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A Reexamination of the "Voluntarism" in Mao's Strategy and Thought〉，Mark Selden 發表的〈Karl Marx, Mao Ze-Dong,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以及 Stephen Andors 發表的〈Mao and Marx: A Comment〉亦承繼了 Pfeffer 的觀點，批評 Meisner 等人皆錯誤的將列寧主義視為原始馬克思主義的墮落，進而亦錯誤的認為毛主義是對列寧主義的退卻。Pfeffer 等人亦指責 Meisner 等人一方面誤將毛視為唯意志論者，另一方面則誤將馬克思視為經濟決定論者。相對的，Pfeffer 等人則主張毛主義是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並且還更進一步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們主張，若將馬克思置於毛澤東所處的環境，很有可能會贊同毛澤東的作法，例如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不斷革命論的主張。Walder 更針對 Meisner 等人對馬克思與毛澤東的錯誤定位，指出這是源於他們缺乏辯證的思維，未能認識到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其實只是同樣事物的不同面向，因而無法認識到毛澤東並非是唯意志論者，馬克思也並非經濟決定論者。(Walder, 1977: 103-105)

面對這樣的批評，Benjamin Schwartz 以〈The Essence of Marxism Revisited: A Response〉一文、Stuart Schram 以〈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feffer-Walder "Revolution" in China Studies〉和〈Comment [on Walder]〉二文，Maurice Meisner 則以〈Mao and Marx in the Scholastic Tradition〉一文回應。Schwartz 首先指出他們和 Pfeffer 等人最大的分歧正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著不同的理解。特別是當 Pfeffer 等人指責他們採用的是機械式的、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時，其實 Pfeffer 等人則是相對應地採用著一個變動的馬克思主義。而這樣的變動是否有其

³³ 雖然Pfeffer並未明言此政治涵義為何，但從前後文可進一步推測是指在中蘇對峙的背景下，藉由強化毛澤東理論的獨立性以對抗蘇聯之意涵。

邊界，且最後是否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因而不再是馬克思主義，則為 Schwartz 對 Pfeffer 等人的主要質疑。(Schwartz, 1976: 461-463) Meisner 除了澄清他從未指責毛澤東侵犯了任何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性典籍，亦承繼了 Schwartz 的質疑，指責 Pfeffer 並未正確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因而未能認識到毛澤東的思想在許多方面實際上與馬克思主義已有很大距離。特別是 Pfeffer 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論述，更顯現出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解上的不足，因為他未能理解到，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核心，是在於被篡奪的國家權力最終必須還給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並且必須採取「生產者自治」的型式，以消滅過去的社會裡以分工的模式實施的專制統治。(Meisner, 1977: 401、404-405)

這場論戰受到相當廣大的迴響，不只《Modern China》特別請 John Gurley 對這系列的文章進行總結性的討論。在評論到 Meisner 的回覆時，Gurley 指出 Meisner 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區別，因而錯誤地主張中國在社會主義階段時就應該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此外，他亦批評 Meisner 未能明確地提出一個有用的框架，以評斷中國是否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Meisner 只是將馬克思的著作與中國的實踐行動進行比較而已，且這樣的研究途徑不僅是非歷史的而且也是不合適的。(Gurley, 1977: 460-461)

之後亦有許多學者特別探討此次論戰，其中又以 Nick Knight 在〈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 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一文的討論最為深入。他除了指出當 Meisner 在澄清 Pfeffer 等人對於他主張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裡的異端後，他卻緊接著主張：「對於毛澤東指出經濟越落後，就越容易...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宣稱，很難想像會有其他相對於此，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更根本的修改的宣稱了。」這樣的論斷不僅顯現出 Meisner 的矛盾，同時亦揭露了他其實是靠引用毛澤東的言論來呈現毛澤東思想的獨立性，並可進一步以此來主張自己和其他人的差別，且還可以宣告自己詮釋的正確性。

(Knight : 19) 此外，Knight (18) 進一步點出：

一個詮釋之所以可以主導其研究領域，並非因為該詮釋在經驗上被推定是具有有效性的，而是因為其他混雜的因素，例如研究者著作的多產、相關機構的支持程度、歷史和社會科學內部思想整體的運作與發展、各種不同詮釋在其學術社群或在各個學術社群間的競爭性等。因此，比起該詮釋自身的內在特性而言，這些因素及其它因素也許是使之有更大的影響之處。

照這樣的說法，Pfeffer 一派與 Meisner 一派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或是對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連結性所做的詮釋，只是兩個可供選擇的選項，實際上彼此皆無法完全否定對方理論的有效性，因為最後能決定雙方之影響性的，往往是其它外在的因素。

中國的學者亦相當重視《Modern China》上的論戰，且基本上對「中國研究知識社群」較為同情，並指出當以 Pfeffer 為首的中國研究社群內部之左派研究者們批評 Meisner 等人忽視「理論與實踐的動態關係、辯證推理、歷史唯物主義和意識問題」時，其實他們是以強調馬克思主義裡的人道主義精神來做為批判的基礎，因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此外，中國的學者亦批評 Pfeffer 等人「對中國社會的歷史環境、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以及中國文化傳統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影響認識不夠」，並且經常「用馬克思早期的思想解釋毛澤東晚年某些錯誤理論」，因而有著過於左傾的詮釋。特別是他們對於「文革」的推崇，更是他們無法區別毛澤東思想正確與錯誤的部分之證明。(尙慶飛，2008：65、70-71)

第二節 其他西方學者對 Meisner 的評論

在《Modern China》的論戰裡，和 Meisner 被歸為同一社群的 Stuart Schram 是西方學術社群裡研究毛澤東的權威，因此對於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對 Meisner 的研究亦有深入的檢驗。〈Review: Mao Studi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一文即為 Schram 因應《The China Quarterly》的邀請，以毛澤東逝世

後逐漸消退的研究熱潮為時代背景，對西方毛澤東研究進行總體評述的重要著作。於此文中，Schram 觀察到當大多數學者因文革新資料的出現，以及中國共產黨宣布了新的關於毛澤東的評價後，紛紛一改過去的信仰，並且修改過去的研究結果時，Meisner 卻未隨波逐流，因而特別令人振奮。然而，在此同時，Schram 也注意到 Meisner 未能重新審視自己觀點中的缺失，而令他感到失望。(Schram, 1984: 100)

Schram 指出，Meisner 過份誇大毛澤東單方面地對農民、青年和無知者的依靠，因而誤認為毛澤東片面地倚重「從精神上和道德上改造人民」的手段，以做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關鍵。然而，Schram 認為，毛澤東在實際上始終如一地強調工業化、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未將經濟的客觀條件降到次要的地位上。而 Meisner 將毛主義設想的未來理想社會，視為毛主義烏托邦中的積極面之觀點，亦被 Schram 批評，指為未能理解對許多經歷文革的人而言，這些理想不過是一場噩夢。至於 Meisner 對於毛澤東建立個人崇拜而未能有效地促進國家消亡的批評，Schram 亦認為當領袖神祕化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時，單獨批評毛澤東是不公正的。而在理論的層面，Schram 則更進一步的指出，國家權力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所具有的積極作用，或許在馬克思的思想中所佔有的成分，恐怕比 Meisner 願意承認的要多得多。最後，對於 Meisner 在其研究成果中，為中國人所提供的專制政治或無政府狀態二選項，對中國人民擺脫困境的期望而言，不僅是沒有意義的，同時也是不可行的。(Schram, 1984: 102-104)

相對於 Schram 的批評，Bruce Cumings 對 Meisner 有著相當高的評價，特別是針對 Meisner 的文革研究，Cumings (1997) 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肯定 Meisner 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使這是經過 Meisner 詮釋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讚譽 Meisner 對於馬克思所設想的民主共有的社會主義，有著有效的理解，因而得以成功地與中國過去所施行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現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有著明確的區別。同時，Meisner 能夠抵擋時代的潮流，不流於盲目

地批評文化大革命，而能客觀地評價文革，指出文革時期難得可貴地設立了抵擋官僚主義潮流的目標，即使最後這個目標未能達成。再者，Meisner 亦能有別於他人而認識到毛時代為工業化與現代化所打下的良好基礎，因而使得鄧小平能在此基礎上快速發展經濟。此外，雖然 Meisner 採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為分析中國的主要架構，但亦能注意到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推進民主的努力，例如魏京生、劉賓雁即受到 Meisner 相當大的關注。

Donald S. Zagoria 對 Meisner 的研究則是讚譽與批判兼之。他讚譽 Meisner 的著作是通得過時間考驗的經典之作，因為相對於其他中國研究者，他能夠不限於僅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潮流，而是能夠藉由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批判性地指出後毛澤東時代在經濟快速成展的同時，也給人民帶來了創傷，例如城鄉差距的拉大以及失業率和犯罪率的攀升。也因為這樣的視角，使他關注到，後毛澤東的中國所採用的資本主義手段，已經使得勞動階級在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裡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但 Zagoria 認為 Meisner 在使用「剝削」的概念時，卻是相當模模糊糊不清的。例如 Meisner 雖然承認勞動階級享有比過去更加富裕的物質生活環境，但他們還是處於被剝削的狀態。不過就整體而言，Zagoria 對 Meisner 仍為正面評價，且特別肯定 Meisner 觀察到像中國這樣的後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社會裡經常性的經濟盛衰循環，而走向極權獨裁的統治模式而非社會民主的統治模式。由此可見 Meisner 對於中國有著敏感且具啟發性的分析，因而得以深刻地理解中國的社會、經濟與政治。（Zagoria，1978）

第三節 中國學者對 Meisner 的評價

中國的學者對 Meisner 亦有相當的回應，其中以蕭延中為主要代表。蕭延中不僅為 Meisner 所著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譯本作序，且在序中對 Meisner 的研究有著詳細的評述。首先，他認為 Meisner 指毛澤東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和唯意志論者是錯誤的，因為毛澤東即使在不同的時期因不同

的社會環境有不同的思考，甚至在後期有脫離現實的失誤，但從未放棄過工業化的重要性。其次，Meisner 認為毛澤東只是代表和依靠農民的看法有待商榷，因為毛澤東始終以無產階級為革命的領導力量、農民為同盟，並且一直清楚認識到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的兩重性，因而經常強調要教育農民。再者，蕭延中亦批評 Meisner 侷限於馬克思理論中關於社會異化的理論框架，而錯將毛澤東思想與後毛澤東時代的現代化理論做簡單的二元對立，脫離了中國的現實環境。最後，蕭延中則含蓄地指出 Meisner 將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主義」思想體系直接運用到現代中國歷史情境中是否合適，需要未來學術界更細緻的討論。（蕭延中，2005a：9-14）

蕭延中（1997：583-586）整理了中國以外的毛澤東研究的一系列著作，特別為文對這些著作進行評價，其中對於民粹主義的部分卻有相當深入的討論。在該文裡他指出，Meisner 是以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主要框架，再加上民粹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作為分析毛澤東的主要理論，並以此檢驗毛澤東在思想與行動上的矛盾之處。他特別注意到，當 Meisner 在使用民粹主義與烏托邦主義時，並非如一般的中國學者一樣地將這兩個理論視為負面的理論；相反地，他對毛主義裡的民粹主義成分抱持著同情甚至是讚許的態度。對於 Meisner 能抱持這樣的態度，蕭延中認為這不僅是代表著 Meisner 能夠接近中國人的真實情感，同時也代表著 Meisner 掌握了充足的證據與嚴謹的邏輯。不過這並不代表蕭延中完全肯定 Meisner 的研究成果，實際上，他對於 Meisner 採用的民粹主義頗有異議，但與西方學者的著眼有所不同，值得一述如下。

蕭延中（1997：587-590）認為 Meisner 混淆了「民粹主義」與「平民主義」，蕭延中指出中國民粹主義的起源在於一九二〇年代，至於平民主義是早在五四時期就有相當大的發展，特別是李大釗在闡釋相關的概念時，即使他經常使用 popular government 這一詞彙，但他所指的概念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或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民本」。由於 Meisner 未能注意到這一點，因此他僅只是從俄國

的民粹主義理論出發，忽略了不僅是對毛澤東本人，同時也對許多中國人有著深刻影響的「民本觀」。其結果，Meisner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認識導致他採取了反歷史主義的論述。再者，蕭延中亦認為 Meisner 未能注意到毛澤東思想理論核心裡，包含著民主的理想，而其中的一部分表現形式即民粹主義傾向。因此是毛澤東的思想中的民主概念決定了民粹主義的內容，而非如 Meisner 所理解的那樣，是「民粹主義傾向規定了毛澤東的民主理想」。亦即，蕭延中認為 Meisner 的理解是顛倒了毛澤東思想裡的主從關係——民主基礎為主與民粹主義表現型式為從。最後蕭延中亦指出，Meisner 將毛主義中排斥城市而眷戀鄉村、反官僚主義、反菁英、相信「落後」的經濟社會狀態有其優勢等等，視為民粹主義的一部分，已經過於擴大民粹主義的內涵；而 Meisner 之所以會這麼做，這是因為他涉及了太多超越他的研究框架的問題，未能採用其他更有效的研究框架對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刻的討論。

不過，就整體而言，蕭延中如同 Zagoria 一樣對於 Meisner 的研究有著相當正面的評價。例如在〈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一文中，他同樣注意到 Meisner 不同於其他學者，在於始終拒絕與時代的潮流相合，而對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不同於一般學者的評價，亦即認為毛時代實際上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即使是中國人所認為的「失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經濟的發展上其實並未如外界所理解的那樣停滯，而且還能夠在此同時對菁英主義、等級主義、官僚主義進行深刻的批判性討論。此外，Meisner 更認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異化、各民族的不平等、戰爭等，將會使得烏托邦徒（Utopians）起而拒絕美國所宣稱的歷史終結之宣言。蕭延中據此指出，Meisner 的論點不只是顯現出他與主流觀點的不同而已，而且也反出他在學術界裡的獨立性，也因此樹立了一家之言。（蕭延中，2003）

對中國以外的毛澤東研究進行綜合性評述的尙慶飛，亦與蕭延中一樣地對 Meisner 關於民粹主義的觀察有所質疑。他雖然同意 Meisner 已能認識到毛澤東

的民粹主義思想有部分是來自於中國傳統，但他認為 Meisner 更強調的是當時的歷史環境對毛澤東所帶來的影響。Meisner 主張毛澤東和蘇聯的革命者一樣，他們都同時面對國外資本主義的入侵，以及國內農業社會缺乏資產階級，所以很容易就產生出民粹主義的思想，以動員農民的對抗為手段，而這是在這樣困難的環境裡，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尙慶飛並不接受這樣的判斷，並且進一步指出毛澤東在徹底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後，就有意識的拒斥民粹主義的思想。例如在毛澤東在井岡山展開軍事活動之時，他就相當注重農民的思想改造工作，以去除黨內所存在的民粹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亦直接以《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主義》明確地批評民粹主義。即使是在 Meisner 視為毛澤東實驗民粹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尙慶飛也認為這個時期毛澤東曾出現一些類似民粹主義的錯誤，但從毛澤東發展工業的主張中，仍可以看出毛澤東與民粹主義之間的區別。不過，尙慶飛也指出，Meisner 與許多西方學者之所以會以民粹主義作為檢視毛澤東思想與行動的主要框架，是因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就如同 Meisner 所言，毛澤東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為了解決這個困難的問題，Meisner 只好尋找如民粹主義的其他視角以研究這樣的新問題。（尙慶飛，2008：370-387）

另一位對 Meisner 亦有相當深入研究的中國學者即楊永康，他依據中國共產黨現行的理論作為評斷事務的標準，對於 Meisner 頗有批評，因為 Meisner 高度評價毛時代，對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詮釋，又對鄧小平時代做出已走向資本主義化的評價。首先，他認為 Meisner 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是偏重於「馬克思關於西歐發達國家的理論」，因而忽視了「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理論」。楊永康認為馬克思晚年注意到亞細亞生產方式，並且肯定「東方落後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以及社會主義可以吸收「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果」的作法。而 Meisner 不僅未能運用這樣的視角對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作出正確的評價，反而囿於傳統的社會主義標準——平均主義，再加上西方發展模式的個人背景，使

得他難以設身處地的理解中國，亦無法理解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因而做出「中國要發展市場經濟，勢必導致資本主義」的錯誤論斷。這樣的論斷也同時證明 Meisner 把市場經濟錯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且現代化不能見容於社會主義之中的理論缺失。（楊永康，2007a）

楊永康還提出另一個無法接受 Meisner 研究的部分，即 Meisner 為鄧小平的理論與實用主義所作的連結。楊永康認為 Meisner 犯了許多英美學者經常出現的一個錯誤，即將鄧小平的理論與英美的「實用主義」混為一談。楊永康從思想來源與哲學觀點兩大方面來區別出兩者的不同。他認為，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主要來源，只是鄧小平較強調實是求是的部分，而這與非唯物主義的、帶有折衷主義成分的實用主義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再者，由於實用主義僅將物質與精神何者具有第一性視為「形而上學」的假設性問題，而未能符合鄧小平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進而有著截然不同的哲學世界觀。且實用主義又將「效果做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將不可避免的導致主觀主義，同時也顯現出與鄧小平所主張的哲學真理不同。對鄧小平而言，他所主張的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情況」的效果，且並非只是強調資產階級個人私利的，而是重視人民群眾利益的。在哲學歷史觀方面，鄧小平也不同于實用主義對社會的不穩定性和動盪性的強調，而是將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作為實踐的前提。綜合言之，鄧小平雖然講究務實，但不該和英美的實用主義混為一談。（楊永康，2007b：21-22）

針對於 Meisner 所指鄧小平因「過於強調生產力發展，將其看作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將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置於遙遠的未來」，並認為「鄧小平將社會主義的目的與手段分離」，楊永康提出反駁。他認為 Meisner 未能認識到社會主義目的的多層次面貌，錯把目的鍊中的一個環節——發展生產力，孤立出來作為目的，而非注意到這個環節不過是在為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服務的其中一個手段，因而沒

有理解到其實在鄧小平的理論裡，社會主義的目的與手段仍然是統一的。因此，實際上鄧小平並非 Meisner 所指稱的「在搞官僚資本主義」，而是始終主張要讓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服務。楊永康相信這正是鄧小平因為認識到毛澤東在晚年的時候犯了錯誤，顛倒「現代化的後發優勢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主從關係，因而提出解放生產力的政策，並正確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一個長期漫長的過程。至於 Meisner 指出因為這漫長的過程裡使用資本主義的手段，導致社會不平等，楊永康亦批評 Meisner 的平等觀僅停留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而忽視了鄧小平思想所重視的機會平等，以及機會平等在未來將為經濟帶來實質平等的可能性，且這樣一個過程理應相當漫長，不能以人為力量縮減。（楊永康，2007b：22-24）

雖然楊永康在擁護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理論之立場上，對 Meisner 有著許多批評，但他並未完全否定 Meisner 的研究。例如，他即相當肯定 Meisner 判斷毛澤東主張「經濟越落後，資本主義像社會主義轉變越容易」，而鄧小平主張「經濟越落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越困難」。但他無法接受 Meisner 將毛澤東視為「唯意志論者」、鄧小平為「經濟決定論者」，因為楊永康認為唯意志論只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部分，特別是晚年才犯的重大錯誤，實際上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倡注重生產力的領導；而鄧小平雖然將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但不代表鄧小平就是一個經濟決定論者。畢竟，鄧小平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同時提倡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提高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高度」，因而「是一種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楊永康，2007b：23）

韓秋紅與史巍則特別針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部分進行深入的探討。他們首先著手區別烏托邦與烏托邦社會主義，指出烏托邦具有雙重的解釋，即努力追求「福地樂土」的崇高，以及尋找「烏有之鄉」的徒勞。烏托邦主義或稱烏托邦社會主義則是馬克思所指的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而這正是因為對「歷史發展的可能性

和必然性的限制和指引作用」缺乏理解所導致的結果。在對兩者的定義作出區別的基礎上，韓秋紅與史巍從三方面指出Meisner將毛澤東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根據的錯誤之處。第一，他們認為Meisner指出毛澤東忽略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前提，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因為實際上毛澤東正是因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國情進行結合，提出「加快對資本主義改造的步伐，使中國快速進入社會主義制度」，才帶來了革命的勝利。因此，這不僅不是烏托邦社會主義式的空想，反而是能根植於現實環境，踏實地往實際目標前進的偉大創舉。第二，他們認為Meisner指出毛澤東否定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亦是一個錯誤的觀察。因為毛澤東雖然依照於對中國革命情勢的理解，而特別將農民視為革命成敗的關鍵，但他始終未拋棄無產階級，並且一直堅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主要依靠農民來完成」的策略。最後，他們認為Meisner作為一個唯意志論者，主張「人們的思想意識和道德潛力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更是對毛澤東的一種誤解。他們不僅尋找出毛澤東提倡物質重要性的文本作為反駁³⁴，亦指出其實毛澤東是「在尊重物質的決定作用的前提下，重視精神的作用。」因此，像被Meisner指為毛澤東烏托邦社會主義驗證的大躍進政策，實際上是毛澤東因應中國一窮二白的現實環境，以「提高人的道德水準、階級覺悟和勞動自覺性」為手段，作為帶領人民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快速途徑，這與忽略現實環境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有著根本的不同。（韓秋紅、史巍，2007）

第四節 小結

由上述整理可得而知，Meisner 不僅因為他所處的是在意識形態光譜上相對較為中間的位置，而較容易受到來自左右的夾擊；同時也因為 Meisner 本身的研

³⁴ 例如中央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註集第 145 頁：「世界是物質的，不是精神的。物質決定精神，不是精神決定物質。」以及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384 頁：「人們想要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與 302 頁：「社會的變化，主要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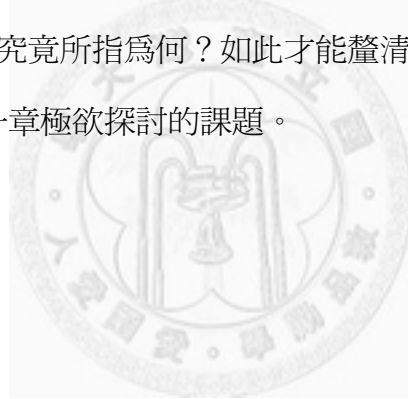
究成果不同於現今的主流觀點，特別是對中國學者的而言，更是不見容於中國共產黨所樹立的理論標準，因此也容易在理論上受到攻擊。但無論是本著什麼樣的立場對於 Meisner 的理論進行批判性的討論，大多數的學者都會特別關注於烏托邦主義、民粹主義與唯意志論的相關研究。

在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部份，其他學者批評 Meisner 不能設身處地的在中國的立場，去注意到毛澤東與中國的革命者面對中國特殊的情勢，必須加快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因而才有大躍進等政策的出現。而在施行這些政策的期間，毛澤東與共產黨為鼓勵人民所宣傳的烏托邦，卻被 Meisner 放大檢視，進而作為毛澤東傾向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證據。在民粹主義的部份，其他學者批評 Meisner 過於誇大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與農民之間的連結性，而未能將毛在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前提下，引進農民的革命力量之創舉，視為毛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創造性發展，反而將之視為民粹主義的根據，不僅錯誤地運用俄國的理論套用在中國的情境，亦漠視了毛思想中傳統中國的「民本」思想根源。在唯意志論的部份，其他學者亦再次批評 Meisner 的誇大性研究，並進一步指出晚年的毛澤東雖然犯了唯意志論的錯誤，而指導了為中國帶來許多創傷的文化大革命，然而這不過是毛思想的一部分，不應過於強調這錯誤的一部分，而忽略掉其他正確的部份。再者，就如同 Meisner 自己的研究成果所顯示的，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實際上在工業化和現代化上面，有著現今許多世人未能正確認識到的高度成就，因而為鄧小平時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這正驗證了毛澤東並非是唯意志論者、民粹主義者以及烏托邦社會主義者。

然而，如果綜覽 Meisner 的所有著作，其實會發現這些學者就如同他們自己的批評一樣，很多時候是在誇大 Meisner 的部份研究。實際上，Meisner 在其著作中是有詳盡研究毛澤東所進行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政策。對於文化大革命時代以前的毛澤東，Meisner 亦有考察到其他非唯意志論的思想，只是對 Meisner 而言，到了文革時，毛已轉變為一個唯意志論者。而關於毛對於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態

度，Meisner 亦有注意到毛和共產黨對於「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宣傳，只是 Meisner 更注意到的是共產黨大多是由農民組成，主要幹部亦多是農民出身，以及無產階級對於共產黨的影響力相當薄弱的實際狀況。因此，Meisner 在其著作裡，已儘可能多方面地關注到毛與共產黨的言行，只是其他的研究者只關注到部份的結論，並以此宣稱 Meisner 誇大了或過於強調毛的部份言行。

最後，或許就如同 Nick Knight 所言，其實這只是不同的學者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理解，來考察其他人的研究，但卻沒人可以从論述的內在邏輯證明自己的詮釋相對於他人更具備有效性，而只是提供另一個可供選擇的詮釋而已。若要進一步探究哪一個選項才是最有效的，也許只有回歸到最根本的問題，亦即 Meisner 與其他學者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有何不同？甚至，要再更深入探討的是，馬克思主義實際上究竟所指為何？如此才能釐清這些不同的詮釋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而這正是下一章極欲探討的課題。



第五章 誰的馬克思主義？

無論 Meisner 的定位是一個中國研究者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從他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詮釋。而當 Meisner 以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來觀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時，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則又是另外一套新的理解與詮釋，因而對這兩個學術社群而言皆有其影響力，同時也容易受到兩個社群各自的夾擊。但是，若進一步檢視這些學者對於 Meisner 的評價，則又會發現，與其說他們是在批評 Meisner 的中國研究，不如說是在批評 Meisner 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帶來的影響。不過這些學者的動機未必相同，往往馬克思主義學者不是出於對中國的關注，而是因為他們與 Meisner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詮釋上堅持的有所不同；可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容許馬克思主義的範疇隨著歷史而開展，乃傾向於借用馬克思主義之名，賦予中國當下的發展某種正當性。由前章可得而知，對於純粹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而言，由於 Meisner 本身甚少參與該領域的辯論，因此較不會受到他們的關注。因此，關心 Meisner 研究的學者大多是來自於中國研究社群，且又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為西方中國研究裡對馬克思主義特別關心的左派學者；另一則為中國之內關心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研究成果的中國學者。

雖然，這些批評可說是起因於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理解與詮釋，但在他們的論戰裡所反映的，是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可以有多種理解，因此經常可以看到某位

學者直接否定其批評對象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甚至直接主張對方所運用的理論不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範疇。比如，Pfeffer 在《Modern China》的論戰中，曾經指出在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核心問題，同時也是 Meisner 在研究中國近代歷史時所關心的，即馬克思主義的屬性：

在哪一點上，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馬克思主義了？對任何「主義」或傳統而言，是否在經過修改、提煉改進、修正後，便不再被視為其傳統理論的一部分？（Pfeffer：1976，440）

而這個問題正是以下亟欲探索的，因此本章首先將探索「馬克思主義」的源頭，嘗試釐清何謂馬克思主義？接著，則將分別探尋西方中國研究裡的左派學者與中國學者所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面貌，以及其背後各自所代表的意義。最後，則將在小結中比較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作為深入理解 Meisner 理論的基礎。

第一節 何謂馬克思主義？

恩格斯曾經五次轉述馬克思的宣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³⁵，相對於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視為其思想泉源，這樣的矛盾足以發人省思。David McLellan 即指出，之所以馬克思會與馬克思主義有所差距，與馬克思思想本身的含混之處有所關聯。首先，在經濟學方面，由於馬克思對於「勞動價值理論是否可作為分析現實經濟活動的有益工具」與資本主義崩潰機制的討論均不充份，而世界經濟體系下的壟斷與帝國主義的運動規律等問題，馬克思亦因此問題在其時代還不是相當明顯的問題，而缺乏完整的討論。其次，在社會學方面，馬克思對於階級的界定並未完成，並且對於農民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留下了許多解釋的空間，因此當中國以農民作為革命的主要力量時，此場革命即引發了許多爭論。

³⁵ 第一次出現在 1882 年 11 月 2-3 日〈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 385 頁。第二次出現在 1883 年 9 月 20 日〈格·亞·洛帕廷給瑪·尼·奧沙尼納的信的片段〉，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541 頁。第三次出現在 1890 年 8 月 5 日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 432 頁。第四次出現在 1890 年 8 月 27 日在〈恩格斯致保爾·拉法格〉，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 446 頁。第五次出現在 1890 年 9 月 7 日在〈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覆——致「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載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81 頁。

再者，馬克思亦未能注意到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也未曾留下有系統的國家理論；至於馬克思本人與其他工人領袖多為資產階級的現象，更未能有妥善的解釋，使得之後無論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產生，或是工人應直接將政權賦予自由主義社會黨人的主張，當事人皆自忖是繼承馬克思的思想，因而是在政治實踐的理論上留下了大空白。最後，在哲學的部分，馬克思雖然認為「基於哲學所提出的是理念原則和本質，而社會主義將會把這些理念原則或本質體現在社會—經濟的現實中，因而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哲學將失去作用。」但是面對革命之期尚遠的實情，哲學卻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了取得解釋世界的一致性，而必須高舉的重要標誌。然而，將「馬克思的哲學」變成一個完整體系的，卻是恩格斯，並由「共產黨正統派所宣揚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將之發揚光大，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礎。(McLellan, 2008a : 2-4)

針對哲學的部分，孫善豪（2008）在〈馬克思主義的三位一體〉一文中，即深刻地檢驗了恩格斯所完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據而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宛如基督教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關係。因此，就像耶穌對天父意志的遵從，並且宣稱天父藉由他的口以佈道那樣；恩格斯經常宣稱他所闡述的觀點大多是來自於馬克思，特別是在馬克思死後，他更成了馬克思遺作的監護人，同時也成為「馬恩關係」的監護人。而這樣「三位一體」的關係，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才發表的《反杜林論》再版序言裡一覽無遺。但也是在這篇序言裡，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將其思想逐漸「轉嫁」給馬克思的過程³⁶。因此，「無論反叛馬克思的伯恩斯坦，或捍衛馬克思的列寧，在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而（竟然必須）引用《反杜林論》的時候，就都會聲明一句：

³⁶ 孫善豪指出，恩格斯藉由宣稱馬克思聽過全部的手稿、參與其中一章的寫作，以及宣稱其觀點都是來自於馬克思的啟發，且這樣的關係是「不證自明」的，來塑造出「馬恩一體」的印象。但事實上，馬克思參與的其中一章不過是馬克思因應恩格斯的請求，對杜林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所整理的「杜林研究資料」，而恩格斯卻在馬克思不知情的情況下，編入《反杜林論》，直到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才公開於再版序言裡指出此章的作者為馬克思。此外，不僅沒有積極的證據可以證明馬克思有聽過手稿，反而有證據反映出馬克思對於《反杜林論》一書始終興趣缺缺的態度。然而，許多後人並未注意到這些令人懷疑之處，而是肯定甚至更進一步地鞏固「馬恩一體」的關係，並且將兩人的思想視為相通的。(孫善豪，2008 : 3-6)

這本書的立論『與馬克思完全一致』。」然而，孫善豪詳細考察後指出，關於這個哲學基礎的核心——對黑格爾的辯證的態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截然不同的³⁷。可是恩格斯卻始終宣稱兩者的一致性，並且也因此使得馬克思必須承受實際上與他無關的思想攻擊。

檢驗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的差異者頗眾。若回到一開始「藉由恩格斯來公開馬克思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宣稱」之動作，對於釐清何謂馬克思主義而言，則是一個充滿暗喻的開始——許多學者正是以區別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作為區分馬克思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步。而區別兩人的起點，應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馬克思逝世的那一刻起。因為，恩格斯從此自由地掌握了對馬克思思想的詮釋權，並且不但在當時對馬克思主義者有相當大的影響，且即於後世，甚至今天仍餘音繞樑不止。因此，恩格斯的詮釋之正確與否，對於欲釐清何謂馬克思思想而言，至為關鍵。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對馬克思的攻擊往往是從恩格斯所填補的理論開始，故想要拯救馬克思主義，似乎切斷馬恩連結是一個大可另闢的蹊徑。比如，對恩格斯有著深入研究的 Terrell Carver，便以挖掘馬恩之間的不同來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可能性，因而一反過往為維持馬克思主義完整性而維護馬恩思想連結性的多數研究。

雖然Caver亦注意到《反杜林論》再版序言，也與孫善豪運用了同樣的證據，因而不約而同的揭露了馬恩實際上的關係，並指出馬恩哲學有其不同，但相較於孫善豪強調馬恩辯證法之間的區別³⁸，Caver對指出馬恩其他的相異處有著較明確的研究成果。他認為馬恩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恩格斯將馬克思的科學觀裡，特別是關於技術和工業的活動，移為審視社會主義知識體系重要性的工具；並且

³⁷簡而言之，孫善豪指出：「恩格斯用物質取代了觀念在黑格爾辯證中的地位，而保留了黑格爾辯證本身的法則地位……而馬克思則反是：正是保留了黑格爾辯證的『唯心的』或觀念的性質，而『唯物地』限制它法則的地位……。」更進一步的詳細的分析，請見孫善豪，2008，〈馬克思主義的三位一體〉，《批判與辯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論文集》，第 10-17 頁。

³⁸ Caver雖然在書中不斷的強調馬恩辯證法式有差異的，但始終未能明確地說出馬克思的辯證法是怎樣的內容。

將物理科學的因果規律做為一種模式，而與歷史、思想以及某種難以置信的現實政治問題相結合之處。」而這樣的結合以「唯物史觀」、「辯證唯物主義」為名，受到後人極大的關注。然而他認為，不僅始終未有積極的證據表明馬克思肯認這樣的結合，甚至還可逕言馬克思抱持的唯物主義與恩格斯是不同的³⁹，兩人這種不同的態度，表現在關於科學如何應用於社會主義理論方面。相較於恩格斯對科學接近於崇拜的態度，馬克思對於科學，特別是科學在社會主義理論上的運用，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例如，在運用達爾文於《物種起源》的觀點時，雖然恩格斯如同馬克思主張階級鬥爭才是社會分析的最重要視角，任何以自然選擇來看待人類歷史的嘗試都是值得懷疑的，但若檢視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卻又可以發現他相當同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信仰的進化論，且這樣的觀點不只與達爾文無關，也與馬克思無關。(Carver, 1983: 118-158)

另一個使得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出現更大的斷裂的，是從未實際受教於馬克思卻經常被視為馬克思學生的列寧。列寧藉由改造馬克思的思想，並且將這些改造的成果歸為馬克思思想，進而成為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至此，馬克思主義與蘇聯的命運因而緊密相連。(McLellan, 2008b: 498) 但列寧所改造、填補的，正是馬克思留下的最大空白之處——政治學，而他所創造的理論，也同時解決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實際上所面對的理論難題。首先，他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主張一個由職業革命家所組成，並且施行著「民主集中制」的政黨，將負起領導受剝削階級的工作。接著，他主張在資本主義並不發達，因而資產階級相當軟弱的俄國，無產階級將肩負起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專制政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的工作。此外，列寧對於馬恩時期尚未出現的帝國主義，有著鮮明的立場。不同於考茨基主張資本主義國家「將以某種國際卡特爾的形式和平地分割世界」，列寧認為和平不僅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還會越來越激烈，因而帝國主義時期可謂資本主義的「垂

³⁹ 但事實上，Caver對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並未有明確的闡釋，而只是以對科學的應用性有著不同的態度，做為一個模糊的解釋。

死」階段，並將為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好所需的客觀與主觀的先決條件。不過，這些理論都比不上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的著作中，為馬克思主義，甚至可說是為整個政治學理論所做的巨大貢獻。列寧認為所謂的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因此，革命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打碎國家，取而代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是，「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制度形式，列寧卻未有明確的解釋。（McLellan，2008a：87-4）姜新立（1991：導論 9-12）仔細觀察這些理論的根源，發現列寧所跟隨的並不是馬克思，反而將他歸類成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恩格斯信徒。

除了恩格斯與列寧對於馬克思的思想所進行的改造外，另一個造成馬克思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出現斷裂的，是不斷被挖掘出的馬克思手稿，使得研究者對馬克思的思想感到混淆。特別是早期馬克思著作——《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的出現，展示了「異化論」這樣一個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理論，與晚年的馬克思所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因而使得研究者將馬克思的思想區分成「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姜新立（1991：4-5）甚至認為，應該再細分為三個時期，即青年馬克思、中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其中，青年馬克思是以「經濟學哲學手稿」為特徵，中年馬克思則是以《共產黨宣言》為特徵，老年馬克思則是以《哥達綱領批判》、《第一國際開幕詞》、給查蘇維奇、米海洛夫斯基的信件為特徵。至於哪一個時期的馬克思思想最可以代表馬克思主義，正是馬克思主義者爭論的焦點。鄭學稼亦抱持相近的看法，指出思想舞台上有三個馬克思活躍著，其一為「異化論的早年馬克思」，並且明顯的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也就是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其二則為「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發生為止的馬克思」，由於列寧所引用的著作皆是出自於這一個階段，因此可說是此時期的馬克思之繼承人；其三則為「巴黎公社後的馬克思」，主張「階級合作、社會運動，和只在無產階級成熟後才会有社會主義革命」的考茨基，與其所領導的第二國際為此時期的馬克思之繼承人。基於這樣的分期，鄭學稼（1992：

543-544、558) 更進一步指出，在一八四四年底前的馬克思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哲學上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在經濟學上信奉剩餘價值論、在社會學或歷史哲學上則相信歷史唯物主義，並且他們認可的最重要的改變世界之手段是階級鬥爭，但此時期的馬克思只有在階級鬥爭的部分有著較成熟的思想而已。然而孫善豪（2008）認為，這樣的區分正是肇因於恩格斯以及後人對馬克思的錯誤理解，才未能認識到馬克思思想的一貫性。

無論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有著多大的斷裂或互相矛盾，以馬克思為名的理論體系具備豐富的理論內涵，不僅對許多人造成影響，更左右了歷史的進展。若要審視這樣複雜的理論體系，或許可以採用 McLellan 所揭示的方法，「把它看作是試圖與這些社會中一系列主流思潮相妥協、甚至相融合的歷史」(McLellan, 2008b: 500)，而那些批判 Meisner 馬克思主義詮釋的學者，正反映了這樣妥協融合的歷史。在《Modern China》上與 Meisner 等人整開論戰的 Pfeffer 等人所依恃的，正是以「青年的馬克思」理論為主要核心的「人道的馬克思主義」；而中國的學者所採用的，則是中國共產黨自成體系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第二節 人道的馬克思主義

如前一章所述，尙慶飛在批評 Pfeffer 等人時，直指他們由於強調馬克思主義裡的人道主義精神來做為批判的基礎，因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雖然 Pfeffer 等人在論戰中，未曾具體說明其所依恃的馬克思主義是屬於哪一個派別，但若審查他們的主張，則可以發現 Pfeffer 等人與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相似。

所謂人道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界尙未有統一的定義，但綜合各方說法，廣義的人道馬克斯可泛指所有認為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人道主義關懷的詮釋，並且通常回溯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即名為青年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例如美國的新左派由於經常藉由「異化」概念強調馬克思主義具備人道主義的一面，其中 Herbert Marcuse 豐富的著作則更使得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影響廣被，因此新左派也經

常被視為是一種人道的馬克思主義⁴⁰。(McLellan, 2008a : 338) 狹義而言，則是指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之間東歐的若干馬克思主義者⁴¹，他們由於史達林的侵略，認識到蘇聯官方所宣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過是「批著馬克思主義紅袍的沙皇主義」，因而與以國際主義為本的馬克思主義有極大差距；畢竟史達林施以蘇俄和東歐國家的暴政，毋寧是違反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展現的重要人道主義精神。(鄭學稼，1992 : 553)

人道主義者從馬克思早期的著作裡，發掘出馬克思將個人置於社會主義關注焦點的傾向，馬克思支持著一種更廣泛的民主，以及由工人自己管理產業的制度設計，以分散政治權力、克服異化，最終創造出一個「自我表現的和自我創造的勞動社會」。相對的，他們認為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理念有本質的差異性，因為蘇聯未能建立一個「保障基本公民自由權的自由工人國家的模式」，並將社會主義的人性化無限地推遲。且這些主張並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變革，而是基於恢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企圖。(Agger, 1991 : 290-295) 至於此理論的核心——異化，指的是一種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未被世人所發現以前，廣為人忽略的馬克思道德觀，即是以「人」為主要的關懷，且這樣的人是有精神生活的人，因此當人受到物質條件、必須條件的支配後，就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的生活和思想，都必須表現自由的選擇」。(鄭學稼，1992 : 544-545) 其間，異化的主要形式表現在四個命題上：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相異化、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勞動者與他人相異化，以及勞動者與「類存在」相異化，且這四個命題「不只是被馬克思用來描述勞動者在古典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狀態，而且還被用來批判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社會」。(李英明，1-7)

除了《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洪鑣德另外發掘在《黑格爾法哲學批

⁴⁰ 雖然本研究尚未找到明確的證據以證明Pfeffer等人確實受到新左派的影響，但由於該場論戰與新左派盛行的時間相差僅大約十年左右的時間，因此並不完全排除相當關心馬克思主義發展的Pfeffer等人受到新左派影響的可能性。

⁴¹ 這些人有時也會被稱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判》、兩篇〈論猶太人問題〉以及〈關於詹姆士·穆勒的註釋〉等馬克思的早年作品中，所展示的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粗放的遠見」。從這些作品可以清楚看到此時期的馬克思所獨有的民主觀。特別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裡，馬克思首先否定黑格爾國家學說裡的君主、議會與官僚制度，反而提倡市民社會的成員必須參與政治、社會，與經濟領域裡的公共事務，進而主張應統一國家與社會、經濟與社會，以體現民主。而這樣的民主，不是代議民主，因為馬克思採用了與盧梭相近的觀點，指出「人應直接經驗著本身的、人類的力量，而不是靠著社會的制度，間接去體會共同原則」，⁴²且個人的活動只有在與其它人類的活動相輔相成之時，才能顯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至於表現這樣的民主形式的制度，即全民投票，如此「參與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同時也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社會化的個人」和「政治憲制的理想狀態」才得以相合，如此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便統一起來。但民主觀只是青年馬克思思想中的一部分，在此觀念背後的，是馬克思對未來社會雖不夠成熟，但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期盼。馬克思主張，在消除了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異化後，人將能夠自由的操作勞動，且每個人所生產的東西都是「每個人能力的對象化與客體化」⁴³的結果。同時，在滿足別人需要的時候，也能夠直接意識到助人之樂，因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人人之間、個人與族類之間的『中介』」，並且在最後所有的人將成為一個共同體。（洪鑣德，1996a：10-19）

不過，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一個「青年馬克思主義」派別，並且特別關注於人道主義的部分，鄭學稼認為相當程度是受到 Georg Lukacs 的影響，且其影響力不只是限於匈牙利和波蘭等國的青年共產黨人，更因他的《青年黑格爾》一書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史有著重要的影響。（鄭學稼，1992：551）因此，他不只在匈共反蘇鬥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更被 Perry Anderson 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因而對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與發展產生影響。

⁴² 這個共同原則是立基於一種集體的、社群的觀念。（洪鑣德，1996a：12-13）

⁴³ 簡而言之，每個人藉由其生產出來的產品，表現出每個人的能力。

McLellan 則認為，Lukacs 對馬克思主義最有影響力的著作應為《歷史和階級意識》。在這本著作裡，他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中第一個認真評價「黑格爾在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之理論家，他反對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強調的「經濟主義」與「自然必然性」，主張應以「階級意識」重新看待歷史，並且轉而強調「意識」的重要性。而取代了「經濟主義」與「自然必然性」的階級意識只能隨著工業革命出現，並且因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分化，而更為「純粹」。同時，他相信，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已擁有世界革命所需的成熟的客觀條件，而世界革命的成功則端賴於無產階級意識能夠實踐為實際的行動；且無產階級將因為這樣的階級意識，可以同時成為歷史的客體與主體，他們的實踐最終將改變現實。然而，正是因為 Lukacs 對意識的強調，使他在當時受到強烈的批判；同時也啟發了反對蘇聯的力量，並影響了之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只是，這樣的發展是在學院內的，實際的政治運作並沒有太大的改變。(McLellan, 2008a: 165-173)

第三節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成果。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詞的出現，最早可溯源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劉少奇在中共的第七次大會的講話中，他指出：「『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是發展著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詞雖然在民間大量出現，但在中共的黨史中出常的頻率卻不高。一直要到第十七次大會，在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科學發展觀整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時候，才明確的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⁴⁴。

在中國學者的整理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涵義，最為重要的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堅持與應用。至於堅持、應用了什麼，則必須立足於中國具體的

⁴⁴ 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相關專書甚多，但就目前初步研究發現，大多著重在敘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容與歷史，但卻未提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詞究竟是如何出現。故僅能從北京日報和文匯報中找到相關的隻字片語做初步的整理，希望日後能找到更詳盡的資料以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詞出現的脈絡。

環境，並且還要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以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但據稱並不能因此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為「儒家化」，或稱此為馬克思主義的變形過程與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恢復，甚至誤認為此即馬克思主義封建化。因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軌跡中，可以看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人在結合中國的革命建設經驗後所發展出來的新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內涵有許多添加。論者同時又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體現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論，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解決中國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與新矛盾，且在這樣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也隨著中國的實情產生了新的內涵，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成果。（何一成，2005：26-53）

但對許多中國學者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其實可以再往前推至李大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何萍和李維武即採用了這樣的起點，並且主張李大釗就是第一個將中國傳統的民彝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相結合，以解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之重要理論家。早在李大釗接受唯物史觀之前，民彝史觀就已深植於李大釗的思想，並且是李大釗接受唯物史觀的重要橋梁。所謂的民彝史觀，即是「通過吸取、改鑄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學所形成的」。「民彝」一詞則是出自於《詩經，大雅，烝民》，意為「人心」；「民彝史觀」指的則是一種從庶民的角度出發，尊重庶民在歷史運動中的選擇與其作用的合理性。而正是因為這份對庶民的重視，使得他很容易被當時正引起世界關注的俄國革命吸引，進而接受「能夠真正引導『民彝』大覺醒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自覺接受唯物史觀的第一人」。李大釗所理解的唯物史觀，指的是將經濟生活視為歷史運動的決定性條件，其他物質條件雖然在人類社會上亦具有意義和影響力，但只能是經濟要件的支流；經濟構造則被視為是社會的基礎，其他包含法律、政治、倫理與其他精神現象，只是社會的表面構造，並且受到經濟構造的影響而可能改變其面貌。其中貫穿於整個唯物史觀的，即馬克思對「生產力」的掌握，並且取

代了「民彝」對於歷史運動的影響。基於這樣的理解，李大釗因而批評「馬克思過於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而忽視了人類精神的作用和改造」。但何萍與李維武認為，這樣的批評正顯示了李大釗因為當時能掌握的資料有限，所以產生了對馬克思的誤解。不過對於李大釗所提出的以「物心兩面的改造」，作為彌補馬克思不足之處的作法，卻顯示了李大釗在民彝史觀的影響下，雖然誤讀了馬克思，卻仍然因為這樣的補足而不經意地正確掌握了唯物史觀。（何萍、李維武，2002：42-58）

但若要探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最具影響力的歷史起源，則應從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詮釋與應用研究起。例如在溫洽溢的研究中，即發現毛澤東所開啓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與其客觀的歷史條件相關，進而指出毛澤東所處的十九世紀中國，正是列強以帝國主義型態的資本主義強迫將中國推進世界史的過程，而馬克思主義則是作為抗拒中國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股對抗的力量。因此，有別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由於中國仍保有獨特的歷史特徵，因此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有著另一項重要的功能，即是許諾了中國民族從資本主義霸權中的解放，並以主體而不是客體的姿態走進世界史。以此推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面臨的是一種相互整合（也是相互矛盾）的歷史處境」。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有著歐洲中心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特質，而這樣的特質與民族主義的許諾相矛盾。（溫洽溢，1997：184-185）

鄧小平不僅在中國的黨史裡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許多中國學者更認為鄧小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與毛澤東有著相同的，甚至更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認為，鄧小平理論不僅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從屬於同一個思想體系，並且賦予了更符合中國國情與時代精神的理論新意。例如在哲學基礎的部分，鄧小平將來自於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精神，將思想解放聯繫起來，同時強調要避免「左傾」與「右傾」的危險。而鄧小平在考察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後，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將當時的中國

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而需要解放生產力，甚至採取前人所反對的市場經濟手段，以為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而在這樣的作法中所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則是社會主義理論上一個「重大的飛躍」。此外，鄧小平還關注到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未能注意到的問題，就中國的統一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創造性構想，因而突破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田克勤，2006：237-446）

至於江澤民所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軌跡中，則扮演著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角色。若分別檢視三者的重要性，則將會發現「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關係基本原理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相互關係的基本原理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歷史地位原理的繼承和發展。」（田克勤，2006：447-493）現今的中國主要領導人胡錦濤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理論，亦同被歸在屬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三個代表」同樣的理論脈絡，他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有著內在的理論聯繫，因而同屬於一個思想體系。科學發展觀針對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未能注意到發展的全面性⁴⁵與協調性⁴⁶，以及可持續發展力較弱⁴⁷等相關問題，而提出的相應理論。該理論強調要以經濟為中心、以人為本，進行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同時亦注重發展的協調性與可持續性，以「滿足人的全面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諧社會的理論則是指「以人為主體的社會和諧發展狀態」，並包含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等內涵。（田克

⁴⁵ 田克勤認為，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教育衛生文化等發展的停滯與落後等方面。（田克勤，2006：498）

⁴⁶ 田克勤認為，主要表現在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繼續增長、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加等方面。（田克勤，2006：498）

⁴⁷ 田克勤認為，主要表現在資源短缺、人均資源明顯不足，以及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加劇等方面。（田克勤，2006：498-499）

勤，2006：494-520）

由上述可得而知，中國化後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有著相當程度的複雜性（與理論的矛盾性），也因此使得相關研究之間派生許多歧異。例如姜新立即將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所經歷的轉化稱作是「後共產主義與後社會主義」，這樣的轉化不僅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實際狀況貧弱的解釋力，同時也顯現出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實踐具有多樣性與多變性。而實際上內容有著極大不同卻都宣稱是在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就是在反映這樣的多樣性與多變性，並且實質上是可套用孔恩（T. Kuhn）的理論，視此為一種「典範轉移」的過程，而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姜新立，2004：177-400）

同樣採取「後社會主義」作為分析架構的李英明亦指出，研究中國不能採取簡單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元分析架構，而是應該以後社會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的向度為基礎。亦即將社會主義與中國的國情或民族條件相結合，並且因應現實的發展進行修正調整，故而不宜將社會主義視為一種普遍的真理。因此，當毛澤東於延安時期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始，可說中共便已開啓了後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即使改革開放使得中國與資本主義相接合，但也不能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以資本主義為條件的，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已形成互為條件、互為過程、互為證成的辯證有機結合關係」。但也因為如此特殊關係的存在，使得現階段的中國在施行社會主義時，同時具有維護與防止資本主義的雙重角色，而這兩種角色之間的拉扯，也會使得外人在研究社會主義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時產生混淆的可能。（李英明，1995：85-89）

第四節 小結

相對於 Pfeffer 所指出的，在審視他人所採用的馬克思主義時，應確認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是否因為某些概念的偏離，而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McLellan

認為：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現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傾向於把人看作社會的人，而不是孤立的個體；隨著社會學的發展（這歸功於馬克思），我們得以研究改變和改善社會的種種方法；我們以歷史的觀點來正確評價經濟因素在人類發展中的中心地位；我們看到，在特定的時代，思想是與特定的社會經濟集團利益聯繫在一起的；馬克思的批判已教會很多人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教他們至少要努力去減少這些現象。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爲這樣一種語言：數百萬人用它來表達他們對一個更公正的社會的希望。（McLellan，2008b：505）

因此，與其像 Pfeffer、Schwartz 那樣汲汲營營於尋找各派對於馬克思主義詮釋上的相異之處，甚至進一步去否定對方、指對方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不如像 McLellan 關照著馬克思對於他當時所處社會的貢獻那樣，去理解對方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貢獻，當然也包括理解 Meisner 的貢獻。

Meisner 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也是一種對其時代背景的反應。在 Benjamin Schwartz 和 Stuart Schram 的研究基礎上，面對著中蘇對峙的政治背景，以及毛澤東藉由文化大革命所展現出來的對馬克思主義的開創性，Meisner 不得不採取一個不同於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內涵，以理解這些問題。而他跨出的那一步，是對經濟決定論的否定，並且批判了「按照經濟發展來理解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這不代表他否定高度的物質文明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主張的是，「高度的物質文明只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至於他拿來取代過去那種經濟決定論傾向而抱持的新的態度是，根據「具體的政治實踐和變化著的歷史條件對理論所產生的意義，來分析馬克思主義」。因此無論就歷史環境或是自身的理論而言，馬克思主義都應該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理論體系。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之下，Meisner 主張要重新檢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扭轉過去被誤解爲經濟決定論的詮釋。Meisner 認為，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批判的關鍵，出自於

這樣一個假設：人類的本質為生產者而非消費者，且人就是透過生產這樣創造性的工作，不僅感受到愉悅，亦實現了人類的潛能。資本主義就是因為採取非自然且非人道的作法剝奪了生產者勞動的成果，以及生產的滿足感，造成了人的異化，因而受到馬克思的批判。由此可見，「馬克思最初反對資本主義的理論，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的和倫理的批判，而非經濟的批判。」(Meisner, 1998: 193-202)

Meisner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對於社會主義的界定與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有著不同於過去秉持經濟決定論者的主張。他認為，雖然發展經濟是奠定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重要手段，但這個手段不能與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相混淆，更不能本末倒置地將發展經濟視為目的。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該以「社會怎樣組織和實施生產，而不是生產多少來思考和評估社會主義」，尤其是尚未健全發展且基本上已被放棄的「勞動者自我管理」的制度，更應該是被關注的焦點。且如果支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理所展現的社會性與倫理性，則不應支持將勞動做為一種商品，以及以經濟效益為名所倡導的強化分工之主張。此外，與其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視為一種簡單的經濟批判，更好的作法是將之看作是一種社會批判，並將有助於「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更好地評估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傳統」。如能堅持上述主張，則將有助於避免馬克思主義和其它的社會主義理論成為一種「最粗俗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現代化』理論」。(Meisner, 1998: 203-205)

在 Meisner 所闡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 Pfeffer 等人之間，有著相重合之處——皆主張一種具人道關懷的馬克思主義。在這樣的一個交集裡，他們共同接受且運用了「異化」的概念，並以人為主要的關懷的對象，進而主張一種可以發展人類潛能的民主制度。但雙方在人的意志的運用上，出現了歧異。Meisner 對於運用人的意志，甚至是改變人的意志以作為邁向社會主義的作法是否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傳統，相當保留，即使他含蓄地避免指之為「非馬克思主義的」，而說成是一個創造性的作法。Pfeffer 等人則肯認人的意志在社會主義的革命中所發揮的作

用，並指出這樣的作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反映在對毛澤東思想的詮釋上，Meisner 即因為毛澤東思想裡鮮明的、且在毛澤東晚年取得主導地位的唯一意志論傾向，將他的思想視為一種「毛主義」，且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一個創造性的突破。但 Meisner 對於毛主義的定位，卻遭到 Pfeffer 等人的誤解，認為 Meisner 此舉是將毛澤東思想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會有這樣誤解的產生，其一是因為 Pfeffer 等人將 Meisner 視為 Benjamin Schwartz 和 Stuart Schram 的同一中國研究社群，而後兩位即是將毛澤東思想視為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其二則是出自於 Pfeffer 等人對於人的意志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採取更激進的立場之故。

至於中國學者對 Meisner 的研究雖然重視，但卻也同時有著許多批評。從他們主張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觀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幾乎隨著官方意識形態的開展而無所不包，甚至連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實際上沒有直接關連的「一國兩制」政策，也被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部分，並且被視為一種理論的突破。雖然 Meisner 對於馬克思主義亦採取一種隨歷史環境將有所變動的主張，但這樣的變動如上所述是有界限的，而其所設立的界線正是中國學者所不能接受的。特別是 Meisner 對於鄧小平時代開始，將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手段，已與社會主義目標本身產生矛盾的看法，更受到中國學者的排斥，並批評這是 Meisner 未能設身處地、與時俱進所產生的錯誤認識。如果以 McLellan 所揭櫫的觀點視之，Meisner 與宣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仍皆可以保有馬克思主義身分，因為即使是鄧小平以後的理論，也總會宣稱他們是以人為本且重視平等的。只是，這麼一來，馬克思主義也就被前人所無法預期地擴大了，而這正是一開始馬克思在政治學理論中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所造成的結果。但馬克思本人畢竟不是先知，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將會是何面貌也甚少討論，即使是對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特徵有所闡述，也是極為粗略的。事實上，「他較常提到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McLellan, 2008b: 498)

總而言之，就這些參與辯論的學者之時代背景而言，作為美國左派失落的一群，他們似乎想要透過釐清中國的社會主義來尋找挽救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只是有的人藉由浪漫化中國的社會主義來尋求寄託，有的人則是藉由批判中國的社會主義來說明馬克思的理論從未被真正實踐過，因此也不該為任何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負責⁴⁸。但對於中國的學者而言，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目的，似乎是尋找挽救中國的工具。但不同的是，在中蘇鬥爭時期，這個工具是用來彰顯中國的獨立性；在當今則是作為建構中國共產黨推動市場經濟的正當性依據。在釐清了這些學者批評Meisner背後所蘊含的意涵後，使得我們可以更深入的認識Meisner。而下一章即將展示的，就是在運用了各種不同的視角後，本研究所認識到的Meisner。



⁴⁸ 同樣的作法也出現在對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崩解的分析裡。McLellan即指出，由於左派學者從根本上否定蘇聯與東歐對於馬克思理念的實踐，因此共產制度在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帶來太大的影響。同時，至今也還未出現一個對於共產主義解體的重要解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正是因為馬克思著作的概念結構，實際上並不適合用來分析這些不具有明顯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McLellan, 2008b: 504)

第陸章 結語

本研究從一開始檢視 Meisner 所處的學術背景，即中國研究和美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之交集處，同時又被中國學者稱作是一種「美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以大略標誌出 Meisner 的學術位置後；接下來則就 Meisner 的著作本身，去整理並理解他所傳達出來的內容，並且從這些內容出發，去尋找其他人對這些研究內容的評價。然後，在檢視這些評價的過程中，發現原來馬克思主義才是他們和 Meisner 所想要討論的焦點。因此，回溯並且釐清這些人以及 Meisner 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為何，成爲一個重要的任務。在結束這樣的一個回顧後，發現就 Meisner 與其他研究者而言，中國的革命與建國究竟是一場具有創新意義，而首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悲劇；還是一場重複蘇聯經驗，因而只是一場模仿得不太像的鬧劇——正取決於寫劇本的人，是採取怎樣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立場。而這樣的一個立場，是否與馬克思的思想相關，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這些不同的立場所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其豐富的程度，已足以讓持不同的立場者爭論不休，進而使得「馬克思主義」逐漸取代馬克思，成爲一個解釋世界、影響歷史運作的理論系統。

第一節 一場以失敗結尾的悲劇

馬克思主義研究裡蘇聯和共產中國，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對照，特別是在歷史研究與實證研究中。在這樣的對照過程裡，萌生出許多有創意的概念，包括若干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新視角，因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著許多創新的貢獻，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問題。在 Paul M. Sweezy 與 Charles Bettelheim 辯論

中，他們即從對蘇聯的失望出發，不僅提出了一個廣為後人運用的「國家資產階級」概念，同時亦可清楚的看到他們藉由共產中國，特別是當時正在推行的文化大革命，來作為批判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工作之工具。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對他們如此的有吸引力，除了因為運動本身所展現出來的活力以外，也因為當時的中國官方有意識的建構了解放的形象公布於國際，造成許多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片面認識。倘若指 Sweezy 和 Bettelheim 浪漫化了文革，甚至是整個中國，其實是高估了學者超越時代的能力，他們的研究不過就是反映了他們的時代背景與願望而已。

Meisner 當然也不例外，也因為這樣，他才需要在每一批新資料公諸於世後，修訂他的巨作《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目前已經修訂到第三版。然而，即使他因為新資料的出現，因此對於文革有相較於 Sweezy 和 Bettelheim 更為客觀的評價，對於毛澤東的認識也隨著時間越趨全面性，但他始終未曾改變他對於中國革命的認可，視之為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雖然同時也是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實驗。Meisner 認為，這場革命之所以偉大，在於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廣大人民的支持，徹底完成國家政治上的統一，並且在建國後前所未有地成功施行了土地改革與促進經濟高度發展的政策，終而建立了一個富強的中央集權國家。至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實驗之所以失敗，在於中國革命的土壤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社會，其間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力量皆相當薄弱，因此建國以後的土地改革與經濟社會政策，不過就是一場追求社會平等的運動過程，並且為「更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和更有壓迫性的政治專制開闢了道路」。而現今經濟發展手段已遠遠超越社會主義目標的中國，更鮮明地顯示出這場實驗的失敗。

因此，雖然中國因為採取了許多不同於蘇聯的創舉，以致兩者的革命與建國經驗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故對 Meisner 而言，本可以不是一場重複蘇聯歷史的鬧劇，但最終卻還是一場以失敗結尾的悲劇。而這樣的觀點，正反映了 Meisner 對於中國的期望，他將中國視為其馬克思主義理想實踐的夢土，並且始終關懷這

樣的理想是否能夠實踐，即使是面對中國逐漸資本主義化的局面，他仍寄託著未來的中國人能最後能實現這樣的理想。同時，也驗證了前述的批評，可見 Meisner 不僅未能置身於中國，去體會中國人的需求；反而是自外於中國，將自己的理想加諸於他的研究對象之上，並以此作為評判中國歷史的標準。

第二節 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馬克思

無論是 Meisner 或是其他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框架之研究者，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與理論時，經常會遇到這樣一個窘境——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革命留下了許多空白，在建設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的相關理論上，也是如此。因此，論者或是從馬克思那極少的相關文獻裡，挖掘片段並加以延伸，或是自創新的概念和理論之後，再從中尋找與馬克思的思想相連結之處。其結果，馬克思的思想在經過後人的詮釋、修改、擴張後，形成一個解釋範圍廣泛的馬克思主義。

那麼，Meisner 是以什麼樣的方法，解決這個馬克思語焉不詳的部分呢？例如，面對中國這場宣稱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實際上則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Meisner 認為雖然馬克思在其著作裡對農民採取貶抑的地位，但毛澤東卻能夠隨著時代背景與現實環境的不同，創造出一個能為馬克思主義目標服務的獨特且建設性作法，並因此脫離了蘇聯的模式，走出了中國自己的革命之路。此外，Meisner 藉由重新挖掘、認識馬克思對烏托邦主義的相關分析內容，找出現代歷史的各種作用，例如歷史對現實環境所帶來的限制與可能性，則烏托邦主義並非是馬克思所不能容的。甚至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提出了對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想像，實際上就是一種「烏托邦」的設計，因而更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得以相容的可能性。至於馬克思支持民粹主義的直接證據，雖然 Meisner 未能找到，但他從被世人所承認的馬克思學生——列寧——的思想裡，找到列寧受到俄國民粹主義影響的證據，例如列寧和民粹主義皆同樣地強調知識

份子的意識在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以一來，毛澤東思想裡明顯的民粹主義成分，便得以屬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疇了。

Bruce Cummings 認為 Meisner 雖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認識的不夠完全，但對於他在烏托邦與民粹主一方面的詮釋，仍承認是在理論的運用上的優異表現，因而能夠產生出相當有解釋力的中國研究成果。Richard M. Pfeffer 則認為，由於 Meisner 對於馬克思主義有著過於僵化的認識，因此在運用這樣的理論研究中國時，就會導致了對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歷史的錯誤認識。對於中國學者而言，Meisner 的馬克思主義更是「不合時宜」的，特別是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更為不合。而後兩者批評的主要依據，則是 Meisner 並未正視中國的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相結合，即沒有嚴肅對待中國對資本主義的特殊理解，未能體會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階段可以超越的思想，或掌握鄧小平以後對於市場經濟手段的策略運用。但若各自檢視 Meisner、Pfeffer 與中國學者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則會發現他們之間的歧異並非只是對毛澤東或中國的歧異，而是代表著馬克思主義隨著馬克思逝世的時間越久，這個以他為名的理論體系，也距離他的思想越來越遠，因而反映了對馬克思思想認識的歧異，這樣的歧異影響了許多人對於世界的認識，甚至影響了這個世界的歷史。

也因為這樣，回顧 Meisner 的研究以及其周遭的評論，就宛如是在回顧一場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至於 Meisner 和其他人為何要將這些內容填入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採用其他的內容，或許就像他在評論其他人的中國研究時所說的：

猜測如果歷史人物採取其他不同於他們實際所做的做法，歷史會變成什麼樣子，這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只能遵從 G. M. Trevelyan 的結論：「人就是他之所是，後世遲來的智慧對他不產生影響，他只做他做的事。」

——Meisn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因此，本研究亦無意去猜測 Meisner 研究中國時為何不採取其他作法，更無意去

假設如果Meisner採取其他作法時，將會產生出怎樣的研究成果。而是將Meisner的研究視為一個學者透過研究中國，來反映時代的思想潮流，並且展現自身的理念的方式。更明確的說，Meisner正透過他的研究，表現出對毛澤東時代所展現出來的革命活力之緬懷，以及對毛後的中國逐漸資本主義化的失望，並且期帶著未來的一代能夠找回革命的動力，賦予中國甚至這個世界新的生命。此外，我們還看到Meisner本身其實有著一個理想的藍圖，並且將之視為馬克思主義的，而中國在革命與毛澤東的時代，一度相當靠近這樣的理想，但在毛澤東過世之後，這樣的理想卻越來越遠，並且只能期待未來新的革命者的出現了⁴⁹。只是，無論Meisner採用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的思想是遠是近，他試圖以一個更為豐富的「馬克思主義」來作為分析中國的嘗試，其勇氣值得肯定，其斐然的研究成果更是令人佩服的。

但這並不代表本研究完全肯定這樣的研究方法，事實上，隨著時代的演進，客觀的歷史條件已經改變了許多，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主要方法與架構，是否能夠完全解釋中國的歷史，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就像前述的批評中所提到的，Meisner即因為僅僅採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詮釋角度，而忽略了中國文化的詮釋，最明顯地即表現在忽略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對於毛澤東的影響。因此，在理解Meisner的研究方法之後，或許可以再更進一步思考的是，當今是否有其他更適合的工具可以讓研究者更接近、理解中國。本研究雖然無法提供答案，但希望透過檢視Meisner的研究，能夠做為未來的研究者們一個可以參考的對照，以豐富中國研究的內涵。

⁴⁹ 對於有人將Meisner評論為毛主義者，甚至是毛澤東的崇拜者，Friedman認為這是相當不公平的評價。他認為，如果真要定位的話，Meisner頂多只能說是一個烏托邦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定位所代表的意涵是，Meisner對於馬克思主義有其特殊的理解，且最特殊的成分是他對於馬克思主義裡所蘊含的烏托邦主義成分之推崇。而在Meisner所處的年代裡，毛澤東的中國正是最接近這個烏托邦的實踐。因此，Meisner不是一個毛主義者，更不是一個崇拜毛澤東的學者，他只不過是欣賞毛澤東的中國，但僅限於符合烏托邦理想的那一部分。

參考資料

(一) 參考書籍與期刊論文

于治中，1996，〈論馬克思的「意識型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3期，頁185-218，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

于治中，1999，〈意識型態下的馬克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3期，頁187-223，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86，《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信賢，2005，〈組織社會學與當代中國研究評述：反思與實踐〉，載於石之瑜編，《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頁213-250，台北：翰蘆圖書。

王遠義，2001，〈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13卷第4期，頁477-513，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石之瑜，1995，《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

石之瑜，2005，《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田克勤，2006，《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軌跡》，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李英明，1980，〈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導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頁1-7~1-9，台北：時報文化。

李英明，1995a，《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

李英明，1995b，《中國大陸學》，台北：揚智文化。

何一成，2005，《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題研究》，湖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何萍、李維武，200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吳玉山，1996，《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

周曉虹編，2004，《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尙慶飛，2008，《國外毛澤東學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孟祥瑞，2008，《到「西方」寫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的微觀經驗與他的中國學社群》，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所。

柯保安（Paul A. Cohen）著，李榮泰等譯，1991，《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台北市：聯經。

侯且岸，1995，《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侯且岸，2000，《當代中國的「顯學」—中國現代史學理論與思想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姜新立，1991，《新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理論》，台北：結構群。

姜新立，2004，《大轉變：後共產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研究》，台北：唐山。

洪鑣德，1996a，《馬克思社群觀的評析》，台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 洪鑣德，1996b，《跨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台北：月旦。
- 陳宜中，2000，〈再論馬克思論意識型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7期，頁165-185，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
- 孫善豪，1998，〈馬克思論意識型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1期，頁115-139，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
- 孫善豪，2008，〈馬克思主義的三位一體〉，《批判與辯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論文集》，頁1-17，台北：唐山出版社。
- 張靜、靳書君，2008，〈美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概述〉，《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8年第三期，頁80-83，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
- 張曉雲、潘天群，2009，《博弈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楊永康，2007a，〈莫里斯·邁斯納視野中的毛澤東社會主義觀〉，《毛澤東思想研究》，成都市：毛澤東思想研究編輯部。
- 楊永康，2007b，〈評國外學者視野中的鄧小平社會主義觀—以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為例〉，《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4期，頁19-30。寶雞市：寶雞文理學院學報雜誌社。
- 溫洽溢，1997，〈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亞季刊》，第二十八卷第二期，頁173-21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
- 溫洽溢，2005，〈關於美國中國研究機制的意識形態反思—以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為例〉，《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頁3-30，台北：翰蘆圖書。
- 廖高賢、石之瑜，2009，《似曾相識—天安門事件後在美國與台灣的中國印象》，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的知識社群研

究計畫】。

鄭學稼，1992，《青年馬克思》，台北：時報文化。

蕭延中、張慧才，1997，〈附錄 4〉，《「傳說」中的傳說》，頁 574-665，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蕭延中，2003，〈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6 期，台北市：漢鑫。

蕭延中，2005，〈譯者序〉，載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頁 9-14，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韓秋紅，史巍，2007，〈毛澤東思想不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莫里斯·邁斯納商榷〉，《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頁 75-78，北京：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誌社。

格·亞·洛帕廷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格·亞·洛帕廷給瑪·尼·奧沙尼亞的信的片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頁 539-541，北京：人民出版社。

Agger, Ben 著，慎之 等譯，1991，《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Marx, Karl 著，伊海宇譯，《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時報文化。

Marx, Karl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a，〈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頁 359-366，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b，〈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頁 117-227，北京：人民

出版社。

Marx, Karl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c，〈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頁 126-131，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d，〈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頁 268-269，北京：人民出版社。

McLellan, David 著，李智譯，2008a，《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第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McLellan, David 著，王珍譯，2008b，《馬克思》，台北：博雅書屋有限公司。

McLellan, David 著，段忠橋編譯，2009，〈當代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載於《山東社會科學》第 163 期。

Meisner, Maurice 著，俞可平譯，1998，〈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頁 193-204，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Meisner, Maurice 著，張寧、陳銘康等譯，2005a，《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Meisner, Maurice 著，杜蒲譯，2005b，《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a，〈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頁 382-387，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b，

〈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頁 430-434，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c，〈致保爾·拉法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頁 446-448，北京：人民出版社。

Engels, Friedrich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d，〈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覆——致「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頁 80-82，北京：人民出版社。

Selden, Mark 著，翁仕杰等譯，1991，《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Ware, Robert, and Kai Nielsen 編，魯克儉、王來金、楊潔等譯，2002，《分析馬克思主義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Anderson, Perry, 1979.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Andors, Stephen, 1977, "Mao and Marx: A Comment,"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427-433.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Caever, Terrell, 1983. *Marx & Engels :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Great Brita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ummings, Bruce, 1997.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Cambridge: Mass.

Cummings, Bruce, 1997. "The Deng Xiaoping Era: Book Review," *Monthly Review*, Vol. 4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Foundation.

Friedman, Edward, 1977, "Marx and Mao and...",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419-426.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Gurley, John G., 1977, "The Symposium Papers: Discussion and Comments,"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443-464.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Hartz, Louis, 1955.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Brace and world.

Knight, Nike, 1986, "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 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6, pp. 7-22.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dsen, Richard, 1995.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Lellan, David, 1979. *Marxism after Marx,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Meisner, Maurice, 1977, "Mao and Marx in the Scholastic Tradition,"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401-406.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Meisner, Maurice, 1979.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 Atheneum.

Meisner, Maurice, 1996.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 Hill and Wang.

Meisner, Maurice, 2007. *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Cambridge: Polity.

Pfeffer, Richard M. , 1976. " Mao and Marx in the Marxist-Leninist Tradition: A Critique of "The China Field" and a Contribution to a Preliminary Reappraisal,"

Modern China, Vol. 2, No. 4, pp. 421-460.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Pfeffer, Richard M., 1977, "Mao and Marx: Understanding, Scholarship, and Ideology-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379-386.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Rosenberg, G. William, and Marilyn B. Young, 1982. *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 US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ram, Stuart R., 1977a,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feffer-Walder "Revolution" in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 3, No. 2, pp. 169-184.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Schram, Stuart R., 1977b, "Comment [on Walder] ,"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395-400.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Schram, Stuart R., 1984, "Review: Mao Studi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7, pp. 95-125. London, etc.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etc.

Schwartz, Benjamin, 1976, "The Essence of Marxism Revisited: 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2, No. 4, pp.461-472.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Selden, Mark, 1977, "Karl Marx, Mao Ze-Dong,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407-417.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Shambaugh, David, 1993.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Armonk, N.Y. : M.E. Sharpe.

Sombart, Werner, translated by Patricia M. Hocking and C. T. Husbands, 1976.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Plains, N.Y. : M. E. Sharpe.

Starr, John Bryan, 1977, "On Mao's Self-Image as a Marxist Thinker,"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435-442.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Sweezy, Paul M., and Charles Bettelheim, 1971,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Wakeman, Frederic, 1977, "Mar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A Reexamination of the "Voluntarism" in Mao's Strategy and Thought 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 3, No. 2, pp. 161-168.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Walder, Andrew G., 1977a. "Mar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Source: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 No. 1, pp. 101-118.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Walder, Andrew G., 1977b. "Mar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A Reexamination of the "Voluntarism" in Mao's Strategy and Thought," *Modern China*, Vol. 3, No. 2, pp. 125-160.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Walder , Andrew G., 1977c, "A Response [to Wakeman and Schram] ," *Modern China*, Vol. 3, No. 4, pp. 387-393.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Walder, Andrew G., 2002. "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dited Volume 3, Article 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yte, Martin King, Ezra F. Vogel, & William L. Parish Jr., 1977. "Social Structure of World Regions: Mainland Chin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 pp.179-207. Palo Alto, Calif. : Annual Reviews.

Zagoria, Donald S., 1978. "Review : Mao's China :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oreign Affairs*, April. New York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二) 參考網站

Karl, Marx, 1881,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www.xiachao.org.tw/ccdb/data/Classics/ME/letters/2.html> 檢閱日期：2010年1月4日。

Meisner, Maurice, 1998, “Beyond the Rhetoric on China”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8/jul/05/opinion/op-885> 檢閱日期：2010年1月15日。

Meisner, Maurice, 1999, “A Habit of Distrust”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9/may/30/opinion/op-42437> 檢閱日期：2010年1月15日。

Meisner, Maurice, 2000, “CHINA: The Volatile Ties With Taiwan”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0/mar/26/opinion/op-12762> 檢閱日期：2010年1月15日。

李君如, 《文匯報》, 2008-09-09, http://big5.news365.com.cn:82/gate/big5/wenhui.news365.com.cn/ly/200809/t20080909_2019884.htm 檢閱日期：2009年1月20日。

沈寶祥, 《北京日報》2007-02-26, <http://www.beijingdaily.com.cn/> 檢閱日期：2008年12月30日。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1期, <http://ilib.cn/A-QCode~xtgxyxb-shkx200801028.html> 檢閱日期：2009年2月18日。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中國學」知識社群之跨國研究, <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01.php> 檢閱日期：2009年2月19日。

日。

附錄：訪談大綱

1. Maurice Meisner 在美國的學術社群地位如何？他如何被歸類？通常大家談論到他時，第一個想到的會是左派學者還是中國研究者？
2. 你認為 Maurice Meisner 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嗎？或者是個毛澤東主義者？
3. 為什麼他會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或毛主義者)？是否有什麼特殊的個人背景導致他會被這樣的理論所吸引？
4. 為什麼他會對中國有興趣？是因為他想找一個用來對照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理型嗎？這是否導致他有著浪漫化中國的傾向？或者，他有什麼特殊的個人經驗，導致他對中國特別有興趣？
5. 之前曾經在網路上搜尋到一個有趣的資料，中國的學生在列出十大毛澤東崇拜者時，Maurice Meisner 竟然是其中一位。你認為他真的是一個毛澤東的崇拜者嗎？這樣的崇拜是否會影響他的中國研究？
6. 另外一個有趣的網路討論，則說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事實上，在閱讀他的《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我感覺到他對烏托邦主義頗有好感，並且試圖將傳統上認為互相衝突的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主義連結起來。你認為他真的是個烏托邦主義者嗎？他有談論過他心裡的烏托邦嗎？
7. 美國的中國學知識社群還關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嗎？
8. 美國的左派社群與中國學知識社群中關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者，是否有任何的交流、對話、合作甚至衝突？
9. 最後，你認為他最大的學術成就是什麼？